

创新地方志工作 大力推进西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 冯艳阳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地方志书作为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化的兴衰、存续和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西安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为西安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规划了宏伟的蓝图。全市地方志系统作为组织地方志书编纂、开发和利用的主管部门，应该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己任，为西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是以编纂地方志书为重点，做好文化传承。历代修志绵延不绝，迄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所谓“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当代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地方志工作者应该担负起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编纂高质量的地方志书，为后世留下历史和文化。具体讲就是要组织好目前正在进行的二轮修志，编纂好一年一度的《西安年鉴》，开展区县年鉴编纂。

二是以开发地情丛书为突破口，搞好文化挖掘。地情书籍是地方志书的重要补充和延伸，对于文化挖掘意义重大。近年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本着服务中心工作、推动文化建设的宗旨，完成了《西安 60 年图志》《为

西安喝彩》《世园在西安》《西安府志》(校点本)《唐代长安词典》(修订本)等图书项目，挖掘了西安的文化资源，为西安的文化建设增添新的亮点，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下一步要继续加大工作力度，编纂更多更好的地情书籍。

三是丰富传播手段，推动文化普及。着眼全市文化工作，在文化进社区、文化下乡等方面多做工作。尽力克服地方志书部头大、卷数多、价格昂贵，普通群众难以拥有等问题，通过将志书数字化后上网等方式，让更多的读者方便阅读，方便运用，推动文化普及。

四是整合西安地方志资源，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服务。发挥地方志基础性资料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对西安的地方志资源进行整理，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基本资料和素材，提高西安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五是建设西安方志馆，打造西安文化品牌。西安要加快建成 100 个博物馆，打造国际知名的博物馆之城，建设西安方志馆显得更加迫切。西安方志馆集是地方文献编纂，地方文献收藏与服务中心，以及地情展示、咨询、研究和交流为一体的重要文化基地和中心，将填补西安在基础文化设施建设方面的一项空白。

目 录

卷首语

创新地方志工作 大力推进西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 冯艳阳(1)

我们的村落

千古烟波话红庙 童来运(4)

历代名人与西安

杨虎城、李虎臣坚守西安之战 (7)

学术交流

正确处理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的几个关系(上)
..... 李秋洪(11)

人物春秋

西安第一任市长贾拓夫——一个孤儿的奋斗
..... (13)

史料钩沉

武则天并非我国最早称帝的女子 (18)

英国人眼中的清朝——人民文雅而富裕
..... (19)

辛亥革命从哪些方面改变了中国 (21)

于右任与民国前的三份报纸 (22)

冯玉祥死亡之谜 (25)

杀过共产党的新中国副主席 (27)

西安风情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28)

隋唐长安城门趣闻(九)——通化门 (29)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阎良核雕技艺 富小云整理(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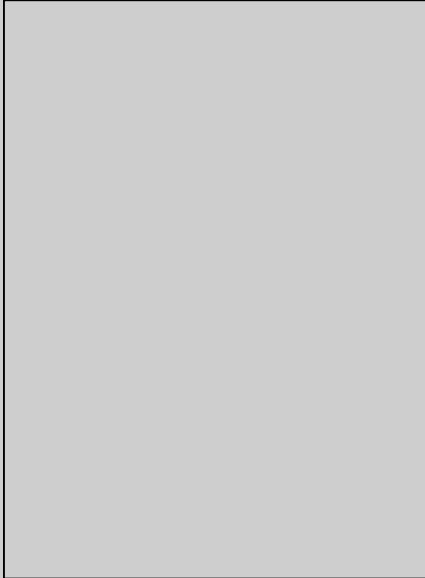
文史拾趣

哪个朝代官员薪饷最高 (32)

宋代如何解决违章建筑问题 (33)

房屋限购令古代版 (35)

善出考题的大宋皇帝 (36)



西安地方志

2012·第1期

(总第214期)

陕新出连内印字第00016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郑板桥躲过“文字狱”	(38)
史上最牛的危机公关	(39)
中国古代书籍是如何演变的	(40)
孙中山使美人计除政敌	(42)

志鉴动态

工程浩繁、成果优秀的旧志整理之作——谈《西安府志》的整理与出版	阎琦(43)
《西安府志》——一项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贾二强(45)
承古开新的扛鼎之作	张永春(46)
校点本《西安府志》——一部传世精品	赵建黎(48)

知识窗

传说中的古代九大毒药	(49)
考试起源于中国	(50)
穿小鞋的由来	(50)
我国最早的信箱	(50)
新年钟声为何敲一百零八下	(51)
孔子生日究竟是哪天	(51)
不到十岁的娃娃皇帝有多少	(52)
“刺青”习俗源于何时	(52)
“浮云”“给力”“囧”	(53)
高跟鞋祖籍在中国	(53)
施耐庵原名施彦瑞	(54)
宋代也有“达人秀”	(54)
曾国藩写活人挽联	(55)
胸佩毛泽东像章最早始于何时	(55)
足球裁判穿黑衣的由来	(55)

历代诗人咏长安

长安春望(唐)	卢纶(56)
---------------	--------

解字

“匕”	(17)
“人”	(30)

名句欣赏

【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等五句	(20)
------------------------	------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冯艳阳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张帆
王莹
委员:崔义萍 杨军亚 彭栋为
高长安 姚文东 崔桂琴
富小云 张耀 高鹏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编:姚敏杰
副主编:高长安
责任编辑:宋亚颖 王文竹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凤城八路109号市政府
大院26号信箱

邮编:710007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http://125.76.215.234:8080/difangzhi/>

E-mail:changannan6861@sohu.com

电话:029-86788731

千古烟波话红庙

◎ 童来运



编者按:村落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向上追溯,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祖先生活过的村落。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一个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或其他项目的实施,加之村落自身的开发等,村落在巨变,部分村落在消失。

思乡之情人皆有之,许多人对自己村落的记忆依旧,许多人也想了解自己村落的过去,更多人想了解西安各个村落的历史与现状。为此,本刊开设“我们的村落”栏目,讲述西安各个村落的发展轨迹,唤起记忆,畅想未来。

(一)

1991年10月红庙村碑撰记:“相传唐时有一寺院,院墙涂为红色,后命名此附近村落称曰红庙。”另据有关资料记载,古时原有一关公庙,因墙染的红颜色,而得村名。

红庙村位于雁塔区境的西南部,地跨西户公路南北两侧,东临陈林村隔皂河与茶张村、双水磨村相望;西倚探花岭与曹里村滩、漳浒寨相邻;北连老烟庄、小烟庄两村;南与袁旗寨、东滩村接壤。全村下辖3个村民小组,220户,930人,均系汉族。2010年有80岁以上领取生活保健补贴老人共有5人,男1人女4人。土地面积1000亩,其中2002年8

月国家已征用103亩。红庙村是丈八街道办事处(原丈八沟乡)西部一个具有古老传统、民风醇厚、历史悠久的村落。

据《长安县志》载,清嘉庆年间(1796~1820)红庙村属长安县河池廩管辖,1929年改仓廩为区乡时归属河池乡。1950年4月撤消河池乡划归郭社区管辖,1954年12月划归阿房区南尧头乡。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归属丈八沟人民公社,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改为卫东人民公社,红庙村也与陈林村合并统一称为红旗生产大队,人们一直习惯称为红庙东村、红庙西村。1984年改公社为乡,1988年3月两村分开又恢复红庙村生产大队,现为红

庙村村民委员会。

据村中“三老”回忆,解放前红庙村不足40户,150多人,以童、许、李姓氏为多,童姓6户,许姓5户,李姓7户,另有张、王、闫、马等姓氏。村民大部分都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移民至此,流传有“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鸛窝”。村中现能收集考察到的有古牌匾四块,童德林家的老屋中悬挂庆贺匾一块上书“豐道孟康”四字。已去世的许振海家保存有功德匾一块,上书“直正方端”四字。童春山家原上房的门顶曾悬挂有门头匾一块,蓝底金字,书“褚猷猶許”四字。童德财家的老祖屋大厅上悬挂庆贺匾一块,上书“福衍箕畴”四字,“文化大革命”中借给儿子结婚为名,制作了木板柜,故得以留存。经考察,四块古牌匾皆为明朝后期至清嘉庆年间之古物。“文化大革命”期间,村中曾出土石碑一重,上书姓名“童大有”,有大清皇帝圣旨赐封字样,并有曾在甘肃天水、清水县为官等字,在破“四旧”中被砸烂后不知去向。

红庙村的土地主要分布在村子西边,人们习惯称为头道岭、二道岭、三道岭,再上去就是唐代有名的探花岭。据传说,唐代在进行科举考试后还要进行殿试。殿试第三名为探花,在参加了探花宴之后,常乘坐车辇到此岭游览,到南湖划舟,观岭侧紫薇、芍药等奇花异草以及漳浒芙蓉。此岭南北走向十里,高约三丈,岭北曾立有一块大石,镌刻“探花岭”三字。相传村西的头道岭上曾有张家古冢一座,竖立有墓志铭一座,上书“明赠玄武大将军”字样。据张姓守墓人后裔介绍,墓主人是其先祖张志明,原为明朝开国洪武帝朱元璋帐下

一员猛将,在战斗中捐躯。从战场上只找回身子,头颅始终未找到。后皇帝赐铸了一颗银头,一同安葬于此地。

20世纪70年代,村子北部还有一约2丈高的土台,面积约1亩地,上建有一座大殿,人们称楼台庙,民国中期曾在此设有私塾。庙背后东西有一长数里、宽3丈的深沟,据考证是1926年河南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时挖掘的。村南偏东有一庙宇人称关帝庙,偏西叫娘娘婆庙,为妇女祈子之场所。民国后期已改建为小学。解放前村子南门外西边有一约五丈多高砖塔一座,为镇妖辟邪、佑护村庄兴旺和村民安康而建,经考察为明末清初之物。

村南村北原各有一个大涝池,大约都有一亩多地,为全村雨水汇集之地,也是夏日人们种田归来洗涤、妇女洗衣服和小孩戏水之地。文革后被填平,划成了宅基地。

另据甘肃省平凉市(地委)党史记述,革命烈士、共产党员周志学(1905~1932),长安附近西滩村人,1926年学校毕业后在陕西督办李虎臣部刘文伯旅某连任文书,刘镇华围攻西安期间,驻守在城南的红庙村担任该部团支部书记,从事兵运工作,后曾任陕西省总工会总干事。同年12月西安解围,1932年9月去固原地区参与发动兵变,组建了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在开赴平凉途中被地主武装民团包围壮烈牺牲,时年27岁。

(二)

红庙村自古重教。清代长安私塾盛行,村村有塾,红庙小学堂也应运而生,主要传授“三字经”、“千字文”、“识字课本”或讲解“四书五经”。据《雁塔区志》记载,清光绪三十三年

年(1907)在红庙、丈八沟、茶张村、漳浒寨设立4所小学堂。根据1906年大清朝颁布的上谕规定,学堂主要有德育、忠君、尊孔、尚实等课程。民国4年(1915)将小学堂一律改为小学校。开设有修身、演经、国文、算数、体操、唱歌等课程,学员不超过20人。解放初期,笔者曾就读于红庙小学。开始只设初小到四年级,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才改设完全小学。当时语文课文主要有“狼来了”、“妈妈给我缝棉衣,妈妈缝衣多辛苦,我穿棉衣要爱惜”、“小猫钓鱼”等。算术仅为一般的加减乘除,学校教师不足10人,学生100余人,主要为附近袁旗寨、郁家庄、铺尚村及红庙东西两村的农家子弟。2009年红庙小学进行了改建,拆除了红瓦蓝砖土木建筑的教室,投资85万元建起了三层教学大楼。2010年,红庙小学有教职员工16人,其中任课教师14人。有教学场地7.7亩,校舍2000平方米,班级6个,学生300名。另设幼儿班,招收学前儿童43人,幼儿教师3人。百年以来在该校就读学子万余名。

20世纪50年代,红庙村出了第一个大学生童崇正(1937~2003),就读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后先任教西安市52中学,后任西安东方大酒店副总经理、工会主席等。村民童致远(1932~1997)曾任陕西省民族书画院理事,爱好广泛,琴棋书画无所不涉,诗词戏曲无所不能,曾根据日本书法爱好者、电视剧导演花松正卜先生的名字,创作了一首歌颂中日友好的七言冠顶诗,并写成书法作品赠给花松正卜先生。诗曰:

花红叶绿满园香,松茂竹苞青春长。

正值紫气东来日,卜筮龟灵见吉祥。

童致远去世三周年之际,日本友人花松

正卜先生专程前来悲痛悼念亡友,虔诚焚香叩拜,在红庙村传为佳话。

退休干部许正杰(1932~2010)原任西安锻压机床厂厂长,是1965年陕西省7名劳动模范之一,光荣地参加了全国劳动模范大会和1965年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合影。同年12月10日在西安参加中央西北局召开的西北工业交通会议,受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等领导接见并一起合影留念。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红庙村主要以种植小麦、玉米、谷子、棉花为主。1980年实行家庭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根据政府规划,才开始一部分土地种粮食,一部分土地种植蔬菜,红庙村的蔬菜在附近的七里八乡出了名。凌晨成群结队的人力三轮车装满各种新鲜蔬菜出发,下午空车陆续返回,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由单一的种粮逐渐转变为种植经济作物,村民也渐渐摆脱了长期贫困的面貌。

1999年,红庙村的农业经济开始发生了根本变化。吸引外资、土地出租,开始了农村承包土地合理流转。发展商品经济、开发土地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当年就引进10余家企业投资租地办厂,产生了陕西巨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业生态园、西安雁塔探花岭现代农业开发中心、西安雁塔万花岭苗圃、西安现代高效种养殖场、西安秦川牛养殖基地等一批个体企业。全村共出租土地450亩,先后有60户村民受益。有10多户村民自筹资金,利用房前屋后空闲庭院办起了粉丝加工厂。

随着西安高新技术开发 (下转第27页)



杨虎城、李虎臣坚守西安之战

杨虎城、李虎臣坚守西安之战，发生于1926年4月至11月。是原属国民军序列的陕军杨虎城、李虎臣等部，在西安抗击刘镇华镇嵩军围攻的战争。西安军民守城长达8个月之久，拖住了号称10万之众的镇嵩军，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

1925年，刘镇华被驱逐出陕后，南下武汉，讨得吴佩孚的信任和重用。吴佩孚为报国民军发动首都革命之仇，于1926年春，任命刘镇华为陕甘“剿匪”总司令。刘即纠集了曾被陕西人民驱逐出境的镇嵩军旧部及土匪、红枪会、大刀会等地方武装，取得阎锡山的武器弹药援助，在豫西打败了原革命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岳维峻部。当时陕西军务督办李虎臣，国民二军第三师师长田玉杰驰援岳维峻，战败后绕道山西逃回陕西。

刘镇华乘国民二军失败之机，很快拼凑起一支号称十万之众的大军，其中有柴云升部4个旅，贾济川部3个旅，梅发魁部两个旅，王振部4个旅，武衍周部2个旅，何梦庚

部2个旅，憨玉琨部2个旅。刘镇华任命柴云升为陕甘“剿匪”副总司令，入陕前敌总指挥，统帅王、梅、武之师西进，向卫定一部守卫的潼关发起攻击。陕东门户潼关很快被刘军占领，直逼西安，兵临城下。

这时，杨虎城急率第三师从西府回到三原、泾阳一带，与国民二军的留守部队商议抗击刘镇华。二军许多人面对比自己多10多倍的强敌，劝杨虎城“不要以卵击石”。就在这时，共产党员魏野畴、刘含初向杨指出：只要联合驻陕各军，依靠人民，共同抗敌，就能守住西安，保护古城。为此，杨虎城召集高级将领在三原开会，特邀魏野畴参加。他听了大家发言后，决定将部队移驻西安，联合李虎臣，抗击刘镇华。4月16日至18日，杨虎城率部渡渭水、过草滩，进入西安，即投入战斗，稳住了战局，粉碎了刘镇华“和平入城”的迷梦。刘镇华气急败坏，令镇嵩军攻东关、占三桥，四面包围西安，断绝了西安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杨虎城急找李虎臣、卫定一、邓宝珊等各

驻军高级将领商议守城事宜。当时,城内守军有3个部分:一是原国民二军系统的陕西军务督办李虎臣的第十师的一部分;二是原国民三军系统以杨虎城为首的第三师,兵员较多,是守城主力;三是陕西陆军第四师卫定一部的两个团。3部兵力共万余人。5月19日,召开各方将领联席会议,会上,杨虎城以大局为重,建议取消国民二、三军名称,统一改称陕军,推举李虎臣为陕军总司令兼第一师师长;自己为副总司令兼第三师师长;驻泾阳的田玉洁(原属国民二军)为副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邓宝珊为总指挥,卫定一为副总指挥兼第四师师长。并商定三部兵力划地区防守,杨部防区为东城、北城和东关、北关及其附近村庄。李、卫两部共同防守南城、西城、西北角和南关、西关及其附近村庄。会后并通电全国,表示决心:“坚持到底,誓歼嵩匪,以期吾陕父老兄弟之安全而后已。”

西安围城期间,刘军多次攻城,几乎每天都有战斗,均被陕军击败。杨虎城常常率兵冲杀在前,浴血奋战。其中规模较大,关系全局的主要战斗有:

包围西安之战

刘镇华决计第一步先围攻东、北、南三城门,留下西城门逼守军退却,以便占领西安。从4月中旬开始,以第一师柴云升部围攻东城;第四师王振部围攻北城;第三十五师憨玉琨部围攻南城;另以第三师梅发魁部、第五师武衍周部、第六师何梦庚部向城北各村寨搜索扫荡;抽调第四师两个旅向城西南各村寨搜索扫荡。迨至4月下旬,已将西安城东、北、南三面包围,被刘镇华收编的吴新田部李长明亦率一旅之众由鄠县向东推进,配合刘军

围攻西安。不久,刘镇华见城内守军毫无撤退之意,遂下令梅、武两师截断西安通向咸阳的道路。5月中旬,刘部将卫定一部据守西关的少数部队全部赶入城内,但临近城关的制高点,如北郊的红庙坡、吕家壕以及附近的高冢,仍为守军占据。双方为争夺据点死伤甚众。至9月以后,因守军确实无力防守,即逐渐放弃城外据点,刘军始得迫近城垣,将城池围得水泄不通。

挖隧道炸城战

刘军包围西安后,鉴于西安城墙高,护城河又宽又深,仰攻不易,即密议挖地道轰炸城墙。由围攻东关的柴云升第一师,选定东城墙一段,由工程兵挖掘隧道,通至城墙之下,长达一里多地。隧道挖成后,用3个巨大棺材装火药数千斤,并在棺内放置手榴弹为导火索。5月31日晚11时许,一声巨响,烟尘蔽空,不仅城上守军被震跌下来,而且城下进攻的刘军也有不少被震得昏迷不醒。但由于隧道未挖至城墙之下,仅将关墙顶端震塌极小部分,以失败告终。刘军不甘心失败,继而转向城东北角一带进攻,并专门从河南巩县调来挖煤工人挖掘隧道,企图穿过护城河,直达城内。城内守军日夜侦察,设法辨别隧道的方向和距离,遂按其方向掘深沟以防备。当敌军挖透时,用柴草、辣椒面、鼓风机等,向洞口引火煽风,使夹带强烈辛辣气味的浓烟冲入隧道,再向洞内猛射毙敌,使其再也不敢挖地道炸城了。

东北城角爬城战

刘军围城数月不胜,军心动摇。刘镇华焦急之下,于7月上旬的一天召集各师师长商议对策。第四师师长王振请求组织一次猛

攻。刘镇华拨赏金数万,并用炮兵团助战。王即准备爬城云梯**50**架,选好敢死队**300**人,以东北城角为攻击点。**8**月上旬,王振率一旅兵力,用两个团进攻,一个团掩护,另以重炮掩护助攻。王振亲率卫队**1**个营督战。王部先头部队数十人爬上城墙后,即与城上守军展开肉搏战。城上守军人少,渐渐支持不住,即派人向司令部求援。杨虎城接到军情报告后,即转告李、卫**2**人,并命令冯钦哉、姬汇伯两部各抽一营增援,其余各部严加防守。李、杨立即奔赴东北城角,城上守军顿时勇气倍增。此时,王振率领的攻城军已借助云梯陆续爬了上来,但守军毫不示弱,不断将敌军击退。战斗持续到翌日下午,敌军伤亡惨重,败退收军。

西北城角之战

围城日久,援军不至,且守军粮食缺乏,刘军企图引诱守军投降。**9**月上旬,包围西北城角的刘军第二师张连长常带护兵至城河洗衣服,和城上杨虎城部的戴万镒连长时常谈话,渐渐熟悉起来。戴万镒常下城到张连长处聊天,并涉及军务,张见有机可乘,便引戴拜见刘军第二师师长贾济川。往返数次,双方达成内外策应攻克西北城角的协议。其条件是:先由贾师长送给戴连长短枪**10**支,等攻城后晋升戴为团长,其他官兵以次递升。随后,戴派杨排长下城**3**次,约定**9**月**18**日晚献城。一切就绪后,戴遂向丁增华团长报告了上述情况。杨虎城将计就计,诱敌如期攻城,其部署是:杨部抽调两营,各配属重机枪连,潜伏黑女坟附近,俟敌溃退时,协同西关守军夹击敌军;李部和卫部各抽一个营,并配属重机枪连,潜伏西关城河边,配合黑女坟伏兵夹攻敌

军;李、杨各再抽精兵两连,李部担任增强西北城角和西门一线,杨部担任增强西北城角至北门一线,并各由**150**人组成“吊敌队”,每人带绳子一条,准备把敌军吊上城墙;李部史铸(仲容)团长亲自指挥,负责、捆绑看管吊上城墙之敌。当晚**11**时许,贾济川率**3**个旅,携带大量云梯及其他爬城工具,向西北角移动,先头部队一个营到达城河边,派张连长到城下联系妥当后,即令部队赶至城下,攀着守城部队放下的绳子纷纷上城。城上守军将爬上城墙的敌军先缴枪,后用毛巾或破布紧塞口内,迅即关押城内,接连诱吊敌军**100**多人,当李虎臣的马弁缴敌军连长短枪时遭到反抗而走火,诱发守城士兵相继向敌射击,一时炸弹齐掷,砖石俱下,敌军混乱,自相践踏,仓皇逃遁。潜伏城外的陕军即向逃敌猛烈射击,敌军遗体数百具。守城官兵缴枪**400**余支,从护城河捞出长短枪**200**余支。

鼓吹飞机、大炮的威胁战

到**9**月下旬,刘军深感攻城无望,围攻咸阳、三原**40**多天没有进展,麻振武(原驻守同州,被刘镇华收买)师围攻蒲城、富平毫无效果,吴新田部围攻郿县亦无尺寸之功,因而军心涣散,士气消沉。刘镇华为稳定军心,鼓舞士气,急向武汉吴佩孚电请派飞机来西安助战,并大肆散布飞机轰炸的威力。时隔数日,由武汉飞来一架飞机,隔了一天又飞来一架,均绕城高飞,顷刻东去,刘亦未敢下令配合飞机攻城。后又宣扬所谓大炮攻城,当时向部众宣传:“我军由吴佩孚拨给**24**公分大炮一门,炮弹数千发,业已运到,必须先筑高大炮台,才能发挥威力。”当时,刘选定东北城角以北含元殿以南高地,由第四师和炮兵团配合修

筑,炮台长 16 丈,高 6 丈以上,前后修筑一月,修成后放了几炮,并没有发挥威力。

西安解围战

1926 年秋,冯玉祥、于右任由苏联回国,9 月 17 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部响应北伐,援救西安。遂指派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率领马鸿逵、孙连仲、吉鸿昌等 4 个师、6 个混成旅,经固原、平凉东进,于 10 月中旬,前锋部队已到达醴泉。刘镇华得悉冯军前锋入陕,慌了手脚,为缩短防线,减少损失,将第二、第四师 2.5 万余人,由咸阳北撤至渭河南岸,妄图凭借渭河、沔河天险,阻击孙军。孙良诚部到咸阳后由南门外几次抢渡渭河均被刘部击退。孙部后改由兴平过河,分 3 路东进,三四日后,即突破刘军两道防线。此时刘军大队人马蜂拥东逃,退至西安枣园一带。刘镇华与刘茂恩率 300 余骑督战队向西堵截。溃兵见刘堵截,离开大道,四处逃窜。刘镇华见此情景,怒不可遏,一气之下,处死 2 个旅长、3 个团长、5 个营长和连排级军官共 85 人。刘镇华杀官堵截后,溃退有所收敛,后经万选才旅奋力冲杀,重新占领三桥。刘镇华也重新部署兵力:以第一师两个混成旅,第六师两个旅,第四师一个旅投入前线,配合原有第四师两个旅,第二师一个旅,共 8 个旅,总兵力近 5 万人,北沿渭河,南经斗门镇至南山根,西至三桥,东至大白杨一带,采取步步为营,节节阻击,企图拖延时日。此时,援陕军总指挥孙良诚已进驻后卫寨,距三桥仅七八华里。孙亲自督师,攻击甚力。此时,援陕部队刘汝明、马鸿逵、孙连仲、方振武部先后到达咸阳。孙良诚即令刘汝明轻装渡渭河,直驱南山根,再由南山根东进,绕至东

十里铺进行包抄。11 月 25 日晚,刘汝明率部由南山根弓字村出发,行至大兆镇,即与刘镇华部接火。刘镇华闻讯,一面派两个骑兵大队,掩护退却,一面通知大白杨前线及围城部队向渭南撤退。刘亦偕总部少数人员退至渭南。此刻城内军民精神振作,守城军队主动配合友军出击。11 月 28 日早,西安军民不约而同走上大街欢呼。刘镇华军狼狈溃退,互相践踏,途为阻塞。陕西东路各县人民纷纷起来,配合解围部队作战。11 月 29 日,退至华岳庙的刘军与国民联军部队展开激战,周围四乡农民纷纷敲锣击鼓,精壮小伙子有的拿出密藏的步枪,有的手持马刀,有的手握红缨梭镖,有的携带镢、锹,成群结队,从华岳庙四周蜂拥而来,敌军胆战心惊,四处乱窜。刘镇华率部一直撤退到河南陕州,围城战争至此方告结束。

西安围城,历时 8 个月之久,作战地区除西安外,还涉及到长安、鄠县、咸阳、三原、富平、盩厔、蒲城、大荔、郃阳、潼关、渭南、临潼、高陵、朝邑、华阴、华县等。双方投入交战兵力约 20 万人,镇嵩军伤亡官兵约 4 万人,城内军民死于战火及饿毙者约 5 万人。群众被损坏的财产无可估计,仅西安城郊民房被毁数万栋,烧毁麦田 10 万亩。西安围城期间,居民挖掘野菜,剥树皮,摘树叶充饥,以至皮鞋、皮带、皮绳、糠粃、锯末等都成了充饥食。这年多雨,降雪特早,被饥寒折磨的人一经滑倒,便死于冰雪之中。到了 10 月中旬以后,每日饿死者竟有数百人,到解围前几天,每日饿死者超过千人。此战牵制镇嵩军 10 余万兵力,策应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为冯玉祥率部东征创造了条件。

正确处理地方志事业 科学发展的几个关系

(上)

◎ 李秋洪



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人实际上履行着多重角色,不仅是新编地方志的直接编纂者,同时也是担负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重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科学发展一项事业是领导干部政绩的核心内容。政绩是领导干部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成绩和贡献,是领导干部德才素质在实践中的综合体现。科学的发展观与正确的政绩观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推动地方志工作又好又快发展,首先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官修志书,或曰政府主持编修地方志,是中国文化传统之一。自从开展新方志编修以来,各地的修志工作进展情况各有不同。从组织指导层面上分析,这与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人协调处理地方志工作中各种关系的能力和效果有着密切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关系:

一、地方志工作与中心工作的关系

两千多年来,修志一直是中国历代地方行政长官的主要职责之一,而今编纂地方志也仍是政府职责和政府行为之一。地方志工作虽然不是政府的中心工作,但它对中心工作产生影响。20世纪80年代,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地方志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不容易引起重视的工作。”这句话恰当地说明了地方志工作的地位和现状。无论是运用地方

志资料启迪官员、教育后代、传承文化,还是大型建设项目论证、招商引资,防灾减灾,发展地方特色旅游品牌,乃至打造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等,地方志资料都具有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和准确性。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各级政府承修地方志的直接目的就在于资治今人、垂鉴后世。各级政府花大力气组织修志,重视的正是它的资治功能。做好地方志工作,对于推动中心工作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地方志工作者在树立爱岗敬业、淡泊名利的人生价值观的同时,应该有服从和服务于中心工作的强烈意识,主动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要有所作为,才能使地方志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所重视,才能获得自己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声望。

二、修志与地方志事业其他工作的关系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地方志事业所包含的内容已远远超出“一个人、一支笔、一部书”的范围,多样化、信息化、网络化已然成为地方志事业的必然趋势和发展模式。“志、鉴、库、网、馆”全面推进,使古老的地方志传统焕发出勃勃生机,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组织开展地方志工作必须注意突出重点,统筹协调,以人

为本。

一是突出重点。无论地方志事业怎样发展,它的基点和重点始终是修志。只有修出高质量的地方志,地情资料库、地情网和方志馆等其他载体才有牢固的拓展基础,其开发利用和所提供的信息才有真实性和权威性。在纷繁复杂的地方志工作中,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抓住修志这一中心任务和志书这个载体,深入思考如何做好志书规划、指导、督查和编纂,努力提高质量。如果忽略志书的编纂质量,地方志事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将受到损害,地方志工作机构所做的其他拓展性业务也将因为缺乏坚实的史志资料基础而受到质疑。

二是统筹协调。正因为现代的地方志工作是多样化的,作为地方志工作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协调各项工作,提高领导水平,讲求工作艺术,科学调配人力资源和财力,合理地安排工作程序和各项工作进度,做到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有序推进,加快进度。同时合理分配人力财力,人力和财力应向重点工作和项目倾斜,减少和避免各种资源的浪费,实现多种载体并举,使地方志的开发实现新的突破,最大限度发挥地方志的多重社会功能。

三是以人为本。地方志事业离不开高素质人才作为支撑,要高度注重在修志编鉴实践中培养一支业务素质高和思想品德好的修志人才队伍。要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和激励措施,提供良好的工作保障条件,充分调动广大地方志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认识地方志事业的人文意义和多重价值,强化地方志工作者的职业自信心、自豪感和责任感,

树立精品意识,立志编修佳志良鉴,记录和弘扬富有时代特色、民族特色的地方文化。

三、编纂业务职责与组织指导职责的关系

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有两大基本职责:一是编纂本级地方志和综合年鉴,二是组织、指导和督查下级政府或同级政府各部门的地方志工作。既要做管理性工作,还要做学术性工作。朱佳木在谈到地方志工作时指出:“现代方志工作中要分两块,一块是行政管理工作,一块是编纂工作。正因为如此,才会让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序列,这体现了地方志工作作为政府职能的性质。”编纂业务既是一门学问,是学术性工作,也是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基本职责。组织指导督查则对编纂业务起到推动作用,有助于加快编纂进度和提高编纂质量。无论哪种工作,都有其特有的规律,要做好都要研究和发现其规律性,尤其编纂业务,更是整个地方志工作的基础。作为方志办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组织其他部门编纂,要指导和检查本行政区域内的地方志工作,如果自己不懂,也不研究方志编纂的经验、规律和理论,是难以胜任工作的。其次,各地方志办公室都有从其他岗位调入的领导干部,对于这些从其他岗位调到地方志机构工作的领导干部来说,不能长期甘当外行。若有志于在方志领域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潜心钻研方志工作的规律,包括方志理论、史学研究方法、组织指导和督查地方志的经验及规律,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学习,才能成为有较深造诣的方志专家和地方志工作的优秀组织管理者。

(未完待续)

西安第一任市长贾拓夫

——一个孤儿的奋斗



解放战争时期,长期的屯兵和战祸,让西安这个文明古都日渐凋敝。雪上加霜的是,当人民解放军迅速逼近西安时,胡宗南率残部不仅竭力破坏各种设施,还带走了大量民用物资,留给共产党的完全是一个烂摊子。

新市长面前的烂摊子

接手这个烂摊子的新政府首任市长叫贾拓夫。当时还没有成立陕西省政府,西安直接归西北局管。

早在1948年4月21日,解放军收复延安后,接管国统区特别是西安的筹备工作就摆上了西北局的议事日程。1949年5月20日,西北最大的城市西安解放了,此前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已经成立,主任是贺龙,贾拓夫任第一副主任。5月29日,新华社发布了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西安市人民政府已于25日成立。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委任贾拓夫为市长,方仲如为第一副市长,张锋伯为第二副市长。”

5月23日,37岁的贾拓夫从延安来到西安,履新之际赋诗一首,表达了对西安解放的

喜悦之情:“长安别来已十年,故地重逢景非前。全城解放歌声响,满街红旗迎风展。贼昨犹以为穴巢,民今拨云见青天。因怀往事访故人,几番昂首望终南。”

对于当时西安的经济形势,贾拓夫早有准备,他在一份接收准备文件中写道:“西安若以50万人计,每日需粮食600吨,需煤三四百吨,连同油、盐、蔬菜等在内,至少1100吨以上。贸易公司拟组织花纱布、油盐碱、粮食及燃料四个公司以掌握物价,进行调剂。”为对付这种物资匮乏,贾拓夫明确要求,“入城部队及干部均应自带3天干粮,以便在最初3天能有计划地、适当地解决供给而不破坏纪律”。

贾拓夫上任后面临的另一件事,就是如何应对物价上涨。5月15日,西安一块银元兑换6万伪金元券,到18日就涨到了30万。据说,有一位老人把家里养了一年多的一头大肥猪卖掉,卖猪钱没敢动就赶紧去买猪娃,结果这笔钱只够买头30斤重的小猪。因为害怕物价上涨,好多小吃摊不收钱,只收小麦、鸡

蛋。商品贸易回到最原始的物物交换。

为推广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券”(人民币前身),新政府迅速开展了打击贩卖和使用银元、铜元的斗争,同时提高了政府收购银元的牌价,责令公用事业单位拒收银元,只收“中国人民银行券”。

贾拓夫担任西安市市长的时候,儿子贾虹生只有五六岁。在他的印象中,父亲那时很忙,经常见不到人。据当时担任秘书长的常黎夫回忆,他和贾拓夫经常是晚上写文件,贾先写,下半夜三四点钟时,贾去睡,常起来接着写。天亮后,拿着稿子去作报告,或送西北局审议。

贾拓夫担任西安市市长时,最大的贡献在于全力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使西安成为解放大西北的总后方。

他把红军引到陕北来

在纪念中国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之际,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博士撰写出版了《爷爷率红军走过——毛新宇话长征》一书。书中有一节“谁是红军进入陕甘的引路人”,称“有一个人,在中共中央选定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问题上,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就是贾拓夫”,“贾拓夫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落脚陕北做出了重要贡献,起到了进军陕北引路人的作用”。

贾拓夫从 16 岁起参加革命,担任过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1933 年 7 月 28 日,陕西省委在骡马市福盛楼饭馆以吃饭为掩护,开会讨论问题,结果被叛徒出卖,很快有特务上门来抓人。当时,省委书记一出门即遭到逮捕。正在结账的贾拓夫发现险情,立即从后门撤离。陕西省委因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敌人开

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省委组织遭到破坏。身为秘书长的贾拓夫一度陷入困境,他决定要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陕西的情况。

贾拓夫到达上海后,又随中央迁移到江西苏区。在 1934 年 1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上,贾拓夫被选入主席团。在江西期间,贾拓夫在陈云领导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学校担任白区理论班班主任。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贾拓夫成为陕北共产党员中唯一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高级将领。

有关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相关的回忆文章已经很多了。但贾拓夫讲给长子贾虹生的一段经历,今天听来仍为我们所震惊:“父亲说,长征经过川藏一带时,前面的战士吃过的青稞因为不能消化又囫囵拉出来,后面的战士把这些粪便中的青稞拣出来,洗净后继续吃。”

按照通常的说法,红军长征的目的是要北上抗日。但北上的落脚点究竟在哪里?至少出发时的目的地不是陕北。

1935 年 9 月 12 日,中央在四川俄界(今甘肃境内)召开了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抗日,以打通国际路线,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新的根据地。

“当时,红军两个主力兵团到哪里去的问题,关系到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一个共识就是不能再打拼下去了,要保留革命的种子,所以当时中央决定要到中苏边境地区建立根据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刘煜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长征的落脚点由原定的中苏边境改变为后来的陕北,说来有点偶然。俄界会议几天

后,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南部岷县哈达铺镇,这是当地一个大集镇,贸易发达,比较富庶。

那天,哈达铺的旅店老板们惊喜地发现,店里一下子来了很多人,他们衣衫褴褛却和葛礼貌。据说,当时两块银元就可以买1只羊,1块银元可以买5只鸡。张震将军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他和两个通讯员买了3只鸡、5斤面条,居然没有吃饱。

部队休整期间,聂荣臻无意中发现一张阎锡山方面主办的《晋阳日报》。这是两个月前的一份旧报纸,其中有一篇这样的报道——《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子丹徐海东合股,东西南三路援军开陕,太原召开晋西北防共会议》称:“陕北刘志丹赤匪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他们飘忽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

聂荣臻将这份报纸送到司令部,叶剑英看了后急忙找到贾拓夫。

贾拓夫高兴地说:“我们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艰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周旋。”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找贾拓夫询问了陕北革命详情。

“当时根据地分隔,信息不通,中央对陕北的革命情况了解并不多,而贾拓夫就是陕北人,而且此前一直在陕西省委工作,他把刘志丹领导陕北红军开展活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建议党中央到陕北立足,在中央红军决定选择落脚陕北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刘煜说。

听完贾拓夫的汇报,毛泽东兴奋地说:“别说(刘志丹)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他转身向身边的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

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

“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经过6次变化,最终确定在了陕北。这个决策过程中,一张报纸和一个人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刘煜说。

一个孤儿的奋斗

今天的神木是陕西县域经济第一强县,主要仰仗于神府东胜特大煤田的开发。但在上个世纪初,那里山大沟深,十年九旱,是典型的穷乡僻壤。县城内,也只有几千人。

在距神木县城钟楼一百米处的东大街北十字巷2号,有一处砖瓦结构老式房子,如今主人将原来的窗户打开改做商铺,但大门及原先的房门依然保持着原貌——大门的门头是用石砖雕的,里外分别刻了两个字,“致祥”和“积善”,这就是贾拓夫旧居。说是旧居,实际上是“寄居”,贾家当时是租住别人的房子。

1912年11月,贾拓夫出生在这间房子里。贾拓夫的祖父是县城一个屠户,父亲是街头做小买卖的。贾拓夫不到10岁时,父亲贾宽厚不幸染上痲病,不久便撒手人寰。古人认为,少而无父为孤,贾拓夫就是这样一个孤儿。好在他有一个勤劳而坚强的母亲余氏。

余氏勤劳简朴,待人忠厚,还有一手酿造的好手艺,贾宽厚去世后,她靠自己酿、卖醋酱养活一家人。旧社会,只有有钱人才能上得起私塾。据说,为了供儿子上学,余氏卖掉了自己结婚时的全部首饰。

贾拓夫的小名叫贾耀祖。他后来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用过很多化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除姓名之外还有一个字,这个字叫“孝先”。

大概是因为父亲去世早,母亲抚养他太不容易,所以贾拓夫取“孝先”作为自己的字。

贾拓夫孝敬母亲的事迹，至今在神木老一代人中间流传着。

贾拓夫随中央红军到达延安后，曾把母亲接到身边，但老人家嫌影响儿子工作，执意要回神木。可是回到神木不久，老人就生了病，贾拓夫只好把母亲接到延安医治。延安的同志经常去看望这位老妈妈，他们亲眼目睹了贾拓夫伏在母亲身边，心疼地说：“妈，您老病重，我工作忙，常常顾不上照顾您，不能尽孝心，我心里过意不去呀……”

贾拓夫的母亲在延安病逝后，组织十分关心，专门派人按照当地风俗，把老人安葬在神木。“老太太的葬礼很隆重，还有贺龙送来的挽联，可见贾拓夫当时在延安就是大人物了。”蔡振庭回忆说。

整个革命时期，陕北的贡献不可替代，这与两所“红色学校”有关：一所是民主人士杜斌丞担任校长的榆林中学，另一所是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入党的早期共产党员李子洲担任校长的绥德第四师范学校。

当时，这两所学校汇聚了陕北的进步青年，前者培养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后者培养了贾拓夫、刘澜涛、马文瑞等革命家。今天，延安的志丹县、子长县，榆林的子洲县，就是以三位革命家的名字命名的。

1926年秋，贾拓夫考入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学习拔尖，活动积极，常常结合形势写出新诗、小说贴在校园的墙报上，颇受校方和教员器重。

国共合作破裂后，被称为“红色学校”的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严查。许多有共产党员身份的教师被撤换。作为校团委支部书记、绥德学生联合会主席的贾拓

夫也被开除了学籍。此后，贾拓夫回家乡神木，以教员的身份秘密开展党团工作。

1929年秋，贾拓夫等人在米脂县一次集会时被捕入狱。那时，贾拓夫才17岁。敌人找不到证据，又不愿意轻易放人。好在负责审理贾拓夫的国民党官员和贾拓夫是同乡，二人又有师生关系，加上地下党员的担保，贾拓夫被关押半月后即获释。

此后的几年，贾拓夫的革命足迹除陕北以外，还涉及西安、蒲城、城固等地。期间，他与刘志丹有过接触，这为日后他代表中央与陕北红军接触打下了基础。

小树林中的遗体

新中国成立后，搞经济建设的人才比较缺乏，担任西安市市长的贾拓夫被看好。1952年，为加强中央对财经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和陈云亲自点将，调贾拓夫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协助陈云分管交通运输、劳动工资等方面工作，直到1956年。

灾难的苗头从“大跃进”开始。

贾拓夫是国家计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下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关于钢铁产量的问题，他反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认为大跃进“顶其虚名，而收实祸”，这话为日后埋下了祸端。

从大跃进开始，贾拓夫已经感觉到形势越来越不妙。从那时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他全身心投入学习马列，除了偶尔外出搞搞实地调查，参与政治的机会很少。

一次他在西安郊区调研时，发现那里的农民翻地有一丈多深，还说这样深翻土地可以创高产。贾拓夫出生在县城，见过农民种庄稼，他怀疑如此深翻土地是劳民伤财，因为将生土翻到地面后，不但不能高产，只能影响庄

稼生长。

庐山会议上,贾拓夫被正式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极其顽固地反对高速度、高指标”,“也就是反对党,反对毛主席”。从此,贾拓夫退出政坛,先后在几家企业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贾拓夫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自然在劫难逃。1967年5月5日,贾拓夫被几名陌生人挟持后不知去向。两天后,苗圃工人在北京西郊八角村的一个小树林里发现了贾拓夫的遗体——这位只有54岁的老革命,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十几天后,亲人们在太平间里见到了贾

拓夫,只见他半睁着眼睛,额头、眼眶部位有深深的凹坑……

1980年3月20日,贾拓夫追悼大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敬献了花圈。

悼词中写道,贾拓夫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经济工作方面,贾拓夫同志具有深湛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我国经济战线上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

·解字·

“匕”



“图穷而匕首见。”这个“匕”字读作 bǐ,是个象形字。甲骨文①是面朝右而侧立的人形。《说文》认为“从反人”,这是对的。②是金文的写法,仍像人形。③是小篆的形体,颇像“比”字的一半,也是“人”的形象。④为楷书形体。

有人认为“匕”字像“匕首”之形,不妥。因为从甲、金文字看,“匕”字根本不像“匕首”,而颇肖人形,其本义为“人”。卜辞中“匕”与“妣”实为一字,女名。由人推及兽,如“牝”从“匕”,指雌兽。但后世本义消失。《说文》认为“匕亦所以用比取饭”。这是许慎根据小篆的形体及其通行词义而判定“匕”的本义是“汤匙(小勺子)”,比如《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先主方食,失匕箸(筷子)。”“匕”字还可以代表“箭簇”义,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匕入者三寸。”这是指箭头射入三寸的意思。至于“匕首”义,那是从“箭簇”义引申出来的,如柳宗元《古东门行》:“冯敬胸中函(插入)匕首。”意思是:冯敬的胸膛被短剑刺入。

请注意:古代还有一个“匕”字,是“化”字的古体字。许慎说:“匕,变也,从到(倒)人。”可见“匕”与“化”音义皆同。



武则天并非 我国最早称帝的女子

许多人都认为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称帝的女子,其实不然。武则天称帝的时间是 690 年至 705 年,而在 653 年,即唐高宗永徽四年,已有睦州女子陈硕真称帝之事发生,而那时武则天不过是唐高宗后宫里的一个昭仪。

陈硕真所在的睦州(今浙江省淳安县),山高水险,地狭土瘠,是当时开发较晚的地区。陈硕真虽然身为女子,却果敢有谋,暗怀推翻唐王朝的大志,准备建立一个新政权取而代之。

她和历史上其他许多农民起义领袖一样,以宗教迷信为思想武器,秘密号召和组织睦州民众。据说她曾自称得道成仙,即将升天,与乡亲邻居们郑重告别。有人到官府告发,说陈硕真妖言惑众,图谋不轨。官府派人把陈硕真抓了来,却因证据不足,又不得不释放她。陈硕真有个妹夫叫章叔胤,与陈硕真志同道合,也颇有智谋,这时就乘陈硕真被一抓一放之机,宣传说陈硕真升天后化为男子,又回到人间来了,并且还能呼风唤雨、役使鬼神。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陈硕真的信徒越来越多。

唐永徽四年(653年)十月,陈硕真认为推翻唐朝统治者的时机已到,于是发动起义。陈硕真自称文佳皇帝,以章叔胤为尚书仆射,迅速建立起农民政权。接着,起义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章叔胤率领,向桐庐进发,很快占领该



城;陈硕真自率主力为一路,克睦州、下子潜、攻歙州,势如破竹,声名大震。民间盛传陈硕真有神灵保佑,阻挡起义军者必遭灭族之诛,官兵畏惧,往往不战自溃。唐中央政府惊惶失措,连忙派扬州大督府长史房仁裕率大军来镇压。

在这关键时刻,陈硕真却轻敌麻痹起来,她不是集中兵力迎击来犯之敌,而是再次分兵四千,派部将童文宝偷袭婺州,结果走漏风声,婺州刺史崔义玄以逸待劳,在城下布下天罗地网。

这样起义军一到,就陷入官兵的重围,死伤以千计,剩下的也被崔义玄遣散回乡为民。起义军遭此重大挫折,从此一蹶不振。十一月,房仁裕大军开到睦州,与崔义玄合力反攻,起义军寡不敌众,伤亡惨重。最后睦州也为官军攻陷,陈硕真和章叔胤被俘杀。

因为陈硕真的起兵坚持了一个月就被镇压下去了。所以历史学界认定,唯一一个正统的女皇帝应该是武则天。

英国人眼中的清朝

——人民文雅而富裕

这是英国人爱尼斯·安得逊写的日记，记载的是1792年9月至1794年9月来中国时的见闻。此人是200多年前的英国“狮子”号船上的第一大副，当时送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晋见乾隆皇帝。他不带政治偏见地记录了一个真实的乾隆时代的中国形象。

抵达北京

在这个国家里，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是极为众多而且是到处是那么多：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每一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城镇。道路两旁不少别墅田庄散布在田野之间，大为增色，也足以证明其富裕。

我看到许多肉店。店里切肉的模样同我们的相似。在这大城市里，同我们在自己的大城市所见一样，除了各种没有门面的商店以外，还有好几千人叫卖他们的货物。认为中国妇女是被关在屋子里不准与外人相见的见解，是无甚根据的。汇集观看英国使团马车队的大量人群中至少有1/4的人是妇女，这比例数字大大超过在我们自己国内所遇到的由于观看新奇事物而聚集起来的人群中的妇女的数目。我们在北京旅行时所见的妇女，一般的容貌极为娇嫩，面色是自然的优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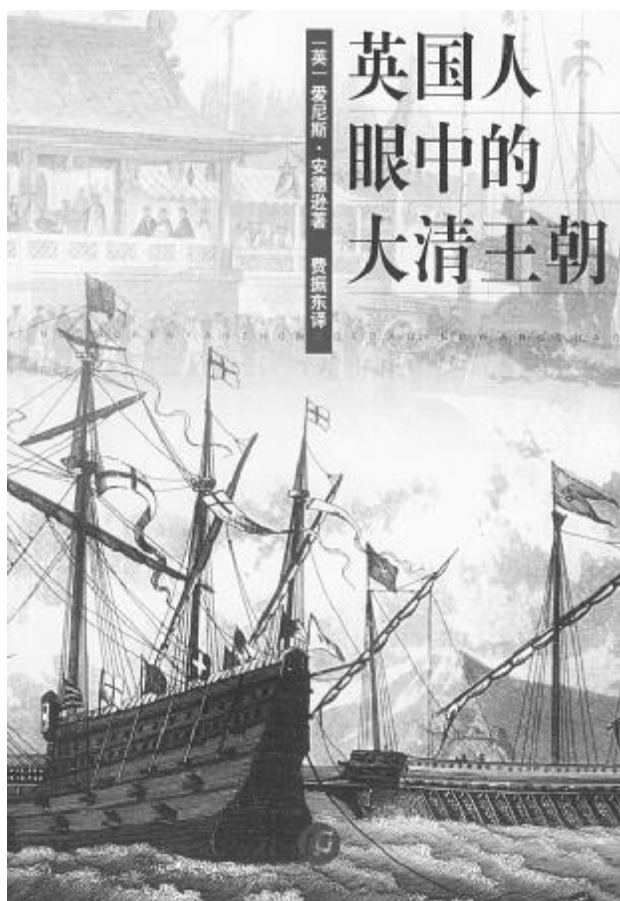
饮食

中国人制造糕点、蜜饯的技术是出色的，味道好，式样与颜色多种多样。他们的糕饼做得值得赞美，味道比我在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所尝到的更为可口。他们的发面食品与我在欧洲吃的同样轻松，而样式之多，我相信集欧洲国家所有制糖果的名师也难于做到。

地方与驻军

运河两岸排列着大量的军队，全副武装，头戴大盔，军容极壮，行列间竖着各色的旗帜。

一个很大的雄伟的城市，有城墙，名叫“庆丰”。它的郊区直伸到水边，其地区之大也就可观了……这城市的周围至少有8英里。从它的外貌和四周环境看来，无疑地，



●史料钩沉●

商业是繁盛的；从它的居民的服装和举止来看，同样可以说，人民是文雅而富裕的。在江边一个很大部队的军队戴着盔胄，全副武装；内中有一大队炮兵，整队而列；全部人数，看样子，有几千人；无数炫耀夺目的旗帜显得军容壮丽。炮兵队穿蓝色衣服，上绣着大炮的形象，与众不同；他们分成几个队伍，分驻在中心地点和队形的两翼。

在广州

居民服装与我已经叙述过的无异，但使我惊异的是，这城市虽已靠南，离北京很远，而在这冬季气候依然很冷，居民要穿上皮衣；这种衣服显然不单是一种奢侈品，或限于上流人士，因为我们所见的皮服装店很多，店里的皮料很丰富，如豹皮、狐皮、熊皮和羊皮都有。这些皮料装得很好，缝成外套，皮毛是向内的。

民间观感

通常在3月1日，依照自古相传的习惯，

在全国各城市都举行大街上的街头演剧，使贫苦人民在无力享乐的情况下，聚集取乐；这种善行要继续好几天，由皇家负担费用，所以在这些日子里从早到晚，普通百姓可以不花分文取得娱乐，并为他们的恩赐者祝福。

一般地说，人民具有健康的容貌：患过天花病的人除了在广州和澳门的沿海口岸以外，实在很少见到。有几种在欧洲不幸经常发生的病在中国看不见。

长寿的乾隆

这天是皇帝刚满85岁的日子，他登基至今已57年。他虽然有一双黑而锐利的眼睛，但是他的仪容则表露出他的品格上的仁慈与和善，和他的崇高地位上的稳重庄严。这是内心修养的结果，不是外表上的雄伟。

我十分佩服这位伟大、显赫、聪明、慈善的中国皇帝。他治理中国近60年之久，按他的百姓的普遍的呼声，他对他们的康乐与兴旺从未忘怀。

·名句欣赏·

【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战国策·秦策一》

使民：统治人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经·小雅》

仰：仰望，瞻仰。止：之。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太上：最高，最上。立德：树立德行。立功：建立功业。立言：著书立说。

【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左传·哀公元年》

树：培养，建立。滋：滋长。疾：毒害。尽：彻底。

【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管子·戒》

当：在。物：名利之物。

辛亥革命

从哪些方面改变了中国



辛亥革命是 20 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它在很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

第一,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是党的十五大提出而似乎被人们注意得不够的重要论断。

在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剧烈变动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做过多种尝试:上层推动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破灭了;下层民众自发的义和团运动同样没有能够给中国指出新的出路。

孙中山先生提纲挈领地提出三个基本问题: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也就是他所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且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些主张,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人提出过,直到现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仍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懈奋斗。

第二,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功绩。

中国在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下已经几千年了。这一专制制度不仅依靠经济、政治、军事的支配和统治,而且通过一整套严密意识

形态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

辛亥革命扫除了中国历史前进的这个严重障碍。尽管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一个又一个政权轮流登场,旧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来。这为旧社会的崩溃和革命的最终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三,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在思想领域也引起十分深刻的变化。它的主要表现有两点:民主精神高涨,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民主精神高涨。民国建立后,尽管许多事实际上依然如故,但民众的心理有了巨大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有权对国家的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社会舆论空前活跃,报纸刊物上对国事纷纷发表种种议论,各种社会团体像雨后春笋般成立,推动并组织起许多群众性的活动。

思想得到很大解放。皇帝在以前是至尊极高、神圣不可侵犯的,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人们去想以前不敢想的问题、发表以前不敢说的主张。



于右任

与

民国前的三份报纸

编撰。该报每天出版对开两大张，辟有“社说”、“要件”、“电报”、“新闻”、“谐文”、“文苑”等栏目，创刊号的“社说”指出：“我同胞三千年来，已受扼于独夫民贼之手，莫或一伸，而今者又并区区言论权亦不可得，爰用愤激纠合同志，创为此报。”该报“宁便让官场恨我，不欲使国民弃我”，以大量篇幅披露清廷出卖路权、矿权，斥之“以傀儡自待”；猛揭官场黑幕，抨击官僚腐败；报道甘肃等地发生严重灾荒，主要官员只顾保乌纱而对上隐瞒，不免田赋，以致饥民“易子而食”。因此，该报受到大众欢迎，“未出版而预订者已及数千份”，很快“销行已逾万纸”。

上海道台（正式名称为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级别介于省、府之间，大致管辖今上海、苏州和启东一带）蔡乃煌在《民呼日报》印行数日，就发函给相关官员要求饬查。

7月30日，受谴责的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也进行发难，致电蔡乃煌：“《民呼日报》馆内所设之甘肃筹赈公所收款不多，如有侵吞情事，应行按律严惩。”蔡乃煌马上与租界当局接洽，于8月2日晚拘捕于右任。大家一看便知，于右任虽为“甘赈”发起人之一，但《民呼日报》仅是给予支持，甘肃筹赈公所由专人主持，以此为借口把他抓起来纯属陷害。范光

1906年秋，于右任在日本考察报业期间，孙中山曾会见他并郑重指出：“当前的迫切任务是为革命做宣传工作。”于右任回到上海后，立即发起创办《神州日报》。孰料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殃及报馆，报馆又发生内部分歧，于右任只好离职而去。初次办报受挫，并未动摇于右任的意志。不久，他决定筹备《民呼日报》，并在申城各报登载启事，其中说：“今特发起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此后，于右任相继在上海出版三份有影响的报纸，为辛亥革命造舆论。

《民呼日报》：“宁便让官场恨我，不欲使国民弃我”

1909年5月15日，《民呼日报》在沪诞生，报馆设于上海公共租界望平街（今山东中路），于右任担任社长，范光启、徐天复等协助

启等马上邀集“甘赈”主事者和经办赈款的银号上堂作证,并由律师严正申明:“甘省灾赈,另有刘道经办,派司账两人管理进出,均有账据,与该报主笔并不关涉。”

于是,按照官府的授意,原皖省铁路协理候补道朱云锦、已故前上海道台之子蔡国桢和湖北新军飞划营统领陈德龙相继出面控告《民呼日报》“毁谤”。这样,于右任就难以恢复自由,他顽强地从监房里传出“宁死不停报馆”的话。但报馆同人明白“报纸一日不停,讼案一日不了”,看到他“被系狱中,备受苦楚”,遂忍痛于8月15日停办该报。官府整垮了《民呼日报》,遂于9月8日结案。

《民吁日报》：“与专横政府对抗,与强霸列强对抗”

于右任出狱后,立刻又带原班人马筹备新的报纸,并在申城各报登载《〈民呼日报〉之最后广告》:“本报自停歇招盘业经多日,近始将机器生财等过盘与《民吁日报》社承接。”

1909年10月3日,《民吁日报》在沪问世,报馆也设于望平街。对于报名,于右任的解释是:“以吁之与呼,字形相近,用以表示人民愁苦阴惨之声;而分析‘吁’字,又适为‘于某之口’,于沉痛中,尤含有幽默的意味。”另



外,“吁”即“呼”去两点,这也暗喻即便清廷扬言要挖掉他的双眼,依然将不停地呐喊。于右任虽实际主持,但不便公开出面,遂由范光启担任社长,景耀月为主笔。《民吁日报》日出对开两大张,版面安排大致类似《民呼日报》,以“宣达民情,鼓舞民气”、“与专横政府对抗,与强霸列强对抗”为宗旨,销量很快直线上升,名声几乎超过老牌的《申报》和《新闻报》。

那时,正值日本加紧与沙俄勾结,阴谋共同攫取中国的锦齐铁路。日本前首相、侵华元凶伊藤博文在访俄途中,窜至我国东北进行活动,于10月26日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击毙。《民吁日报》在事发第二天,率先用大字标题作整版报道,发表评论揭露日本对华野心:“伊藤之满洲旅行,非独为满洲,为全中国也。”而且,称双手沾满鲜血的伊藤博文是“大浑蛋”,死有余辜。同时,该报为了号召人们奋起革命,大声疾呼:“清政失纲,东夷乘衅,陵铄诸夏,惧将倾覆国家,沦丧区宇,斯诚志士致命致节之日矣!”

日本驻沪代理总领事松冈获悉此事,照会上海道台蔡乃煌:“民吁报言论大欠和平,且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中日二国邦交,请将该报惩办,以戒后来。”上海道台蔡乃煌觉得《民吁日报》几乎就是《民呼日报》,他见松冈发怒正中下怀,一面敦促法国驻沪领事馆取消该报注册,一面要求“将该报馆封禁具报”。

11月19日,租界当局以“挑动中日衅隙”的罪名查封《民吁日报》。这激起公愤,宁苏皖赣四省学界数百人联名分别致电北京外务、民政两部和上海道台衙门提出抗议。

蔡乃煌对此火冒三丈,派爪牙暗中搜寻

于右任。据黄季陆回忆,于右任曾谈起:“民吁报被查封后,清吏蔡乃煌正四处捉拿我,我困守在一间小旅馆里,和孔子‘在陈绝粮’一样无计可施。有一位同志很同情我,但是他和我不一样穷,真是爱莫能助。当他经过马路旁一间烧饼铺,乘主人不注意时,取了几个烧饼放入怀里……当我们二人在旅馆中享受这几个烧饼时,禁不住抱头痛哭起来。”

12月28日,日方把《民吁日报》发表的《满洲痛史之鳞爪》、《伊藤怪物之行踪》、《野心家走满之警告》、《满洲风云日急》等数十篇文章作为“排日之证据”,没有经过辩论,该报就被判令“永远停止出版”、“机器不准作印刷报张之用”,于右任则被宣布“逐出租界”。

《民立报》:革命党人的通讯联络机关

由于租界当局的严格限制,于右任无法再次利用原来的印刷设备,他奔波大半年才又办起《民立报》,报名暗寓“立定脚跟作民喉舌”之意。

1910年10月11日,《民立报》在沪创刊,每天出版对开三大张,报馆起初仍设于望平街,由于右任担任社长,宋教仁、吕志伊、范光启、章士钊等先后做主笔。这时,在上海道台官位上耀武扬威的蔡乃煌已离沪。

在发刊词中,于右任把《民立报》比作“植立于风霜之表”,“经秋而弥茂”的“晚节黄花”。该报内容分“论说”、“批评”、“纪事”、“杂录”、“图画”等,新闻版面较多。该报将矛头直指清廷,斥之为“倒行逆施之政府”;对镇压革命的封建官僚进行鞭挞,指其为“民贼”;详细报道黄花岗起义和各地保路、抗捐斗争,赞扬革命党人坚毅勇敢。当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时,其报馆立即成为革命党人的通讯

联络机关。

《民立报》每期发行量曾达两万多份,运销各地。当年,毛泽东也阅读过该报,据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述,后来这位伟人在陕北窑洞里谈及:“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民立报》首先进行报道,随即专门开辟“武昌革命大风暴”专栏,以整版篇幅介绍起义进展情况。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亲自为《民立报》写下“戮力同心”的题词,勉励其保持斗志。

翌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仍兼《民立报》社长。袁世凯窃国,于右任辞职返沪,继续主持《民立报》。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民立报》也是重要舆论阵地。“二次革命”失败后,《民立报》于1913年9月4日被强令停刊。袁世凯曾以北京总检察厅名义通缉革命党主要成员,于右任也上了黑名单,不得不暂避海外。

顺便一提,《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被称作“竖三民”,不少人以为源于它们三个带“民”字的报头,均竖排在首版右上角;其实,这主要是因它们同为于右任一人所发起创办,形式上虽然是三份报纸,实际却可算一种日报的两次再版(与此相对应,同盟会后期在沪报纸《民权报》、《中华民报》和《民国新闻》,因各有主持人,又同时期创刊,被称作“横三民”)。

冯玉祥死亡之



1948年9月5日,苏联《红星报》最后一版不显眼处,刊登了一条塔斯社的快讯,标题为《“胜利”号轮船发生不幸》:“傲德萨9月4日电:八月初,胜利号轮船从纽约启航,驶往傲德萨。因处置不慎,致使电影胶片着火,船在途中发生火灾。有人员伤亡,死者中有冯玉祥元帅和他的女儿。调查仍在进行中。”

在1948年秋,冯玉祥身死“胜利号”,这一事件在西方轰动一时,但苏联报纸对此却讳莫如深。而且,冯玉祥在1948年秋前往苏联绝非偶然。1948年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冯玉祥准备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他的意外辞世给人们带来了不尽的猜测。

归途

1948年7月31日,苏联“胜利”号从纽约启航,踏上了返回傲德萨的航程。冯玉祥与家人也上了船,他们准备转道苏联前往中国。

在海上航行数天以后,船长接到了黑海航运局的电报,命“胜利”号顺路去埃及亚历山大港,接收从埃及遣返回国的2000多名亚美尼亚人,把他们送回格鲁吉亚海港巴统。8月底,“胜利”号终于靠上了巴统的码头。

9月1日中午,位于傲德萨的黑海航运局电台接到船上发来的航行报告,说“胜利”号于9月2日凌晨2点即可抵达傲德萨港。此后,船上的无线电通讯就中断了,但起初并没有人对此产生警觉。

直到9月2日早晨,黑海航运局才开始



探究无线电静默的原因,并请求出海轮船和沿途港口留意该船行踪,但没有人与“胜利”号取得过联系,也没有听见“SOS”信号。航运局感觉事情不妙,连忙向黑海舰队求援。当天晚上9点钟,一位飞行员在空中报告说,在雅尔塔东南70海里处,发现了已被烧焦的“胜利”号,轮船周围还有五条载满人的舢板。

大火

“胜利”号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苏联官方后来的说法是:9月1日13时,“胜利”号班轮上代理放映员、无线电技师科瓦连科见船将驶向终点,决定将电影胶片收拾一下,以便靠岸后将影片送回文化基地。为此,他叫来了一名水手,请他在放映完毕后帮忙缠胶片。在用手摇装置倒胶片的过程中,因机械部件摩擦而迸出火花,进而引起胶片起火。火星又引燃了旁边放着的胶片,火焰几秒钟就充满了整个库房。

随后,火焰开始四处扩散。经过全力扑救,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了。但大部分旅客携带

●史料钩沉●

的物品已难以挽回。而且,全船有 40 名乘客在火灾中丧生。

9 月 3 日,当救援人员靠近事故船时,船上的大火已基本扑灭。9 月 5 日,“胜利”号驶入傲德萨港,获救乘客被转移到了“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号轮船上。

人 为?

在对火灾事故调查时,调查人员提出,火灾有人为破坏的可能。调查人员推测,在亚历山大港口有大量乘客上船,一些破坏分子可能乘机混入其中,从而蓄意引发了火灾。这个假设的依据是,这批遣返回国人员上船后,在船上不同地方都发现了一种块状物体,像是某种矿石。它们在燃烧时可以放出蓝色火焰,并能达到很高的温度。

苏联国家安全人员涅普里亚欣当时也在船上,他出于职业习惯拿了一块去琢磨,但他本人在火灾中丧生。也许是由于普里亚欣已死,调查机关并没有按人为破坏说继续追查。

司法部门经过反复研究,最终认定火灾的主因仍是电影胶片起火。在当时那个年代,世界电影业普遍使用的是硝化纤维素胶片,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易燃。当把这种胶片加热到 40 度时,它就会像火药一样猛烈燃烧。

因火灾让苏联政府极为被动,法庭对火灾直接责任人给予了重判。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法院在调查过程中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胜利”号从纽约出发前,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情。在“胜利”号即将离港前,纽约当局做了个奇怪的决定,要求对“胜利”号进行全船消毒。尽管船长提出了强烈抗议,全部船员还是被迫在旅馆里住了两天。美国人强行登上“胜利”号后,他们的行为并无人监督。

此外,一对准备离开美国的苏联外交人士夫妇发生了争吵。女人叫喊着不愿回国,执拗地跳窗而逃,美国人马上把她救起,并严密保护了起来。而她的行李此时已装上了轮船,恰恰位于船中部起火的位置。

最为蹊跷的是,在“胜利”号实际发生火灾之前,美国的广播电台就提前播报了火灾的消息。

未解之谜

当斯大林得知冯玉祥遇难的消息时,他正在黑海边休假。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毋庸置疑,您是正确的:在亚美尼亚移民中有美国的情报人员,是他们在搞破坏。”

1945 年 12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一条命令,让流亡海外的亚美尼亚人重返故土。从 1946 到 1948 年,遣返苏联的亚美尼亚人超过了 10 万。但在“胜利”号发生火灾后,苏联部长会议于 1948 年 9 月 14 日做出了停航决定,彻底阻断了亚美尼亚人的返乡潮。

遭受火灾的“胜利”号被修复后,仍旧行驶在黑海航运局各条国内外航线上。一直到 1977 年,“胜利”号的名字才被从船队的花名册中删去。

杀过共产党的新中国副主席

在电影《建国大业》中有这样一个情节,1949年6月新政协召开之际,毛泽东亲自拜访了张澜和李济深,请他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李济深听闻这个消息沉吟了半晌,顾虑重重地说,我杀过你们共产党。李济深所表现出来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就在22年前的1927年4月,广州在李济深的主持下开始清党运动,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杀戮。

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时李济深也在上海,他参加了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此时的李济深已经被武汉国民政府免去了本兼各职成为一介平民。而在此之前,他不但是北伐军的总参谋长,还兼任黄埔军校的副校长、广东省政府主席等一系列要职。

李济深被免职的原因很简单,在蒋介石祭起“清共”大旗,公开与武汉决裂的关键时刻,李济深不惜开罪政府的“汪主席”,坚定地站在了军队的“蒋总司令”的一边。

1927年4月14日,李济深回到广



州,当夜他召开秘密的紧急会议,成立了以他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以计划和执行“清党”行动。4月15日黎明之前清洗开始了,几个营的士兵和2000多名武装警察,包围了香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和几十个激进工会的总部,解除了卫队的武装,逮捕了中共领导人。

正是1927年参与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使得李济深对毛泽东的任职感到十分顾虑。

(上接第6页)区向南伸展,许多高科技企业与村庄“零距离”接触。大批务工人员涌入城中村租房居住,红庙村原来的一条街道也变成了三纵四横的格局。村民房屋大部分都盖到了三层,90%的农户都成为了房屋出租户,没有一家从事种田的农户。农民人均年收入过万元,超过了2010年雁塔区丈八街道办年人均9391元的收入水平。

1984年自筹资金46万元完成了全村大

部分街道水泥路面硬化工程,以后又修建了下水道,安装了路灯。2009年投资60万元,修建了自来水塔和管网设施。恢复了两家卫生所,村民都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2010年,投资10万元修起了村民健身活动场所,购置安装了运动器械。投资60万元,修建起村委会办公大楼。526、502路中巴车,928路公交车,户县公共汽车都在红庙设站经过,大大方便了村民的出行和经济的发展。



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

2007年3月24日,由陕西省、西安市政府共同投资,曲江新区承建的曲江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曲江国际会展中心位于西安市南郊文化旅游核心区域——曲江新区内,位置在长安南路与会展路交汇处,电视塔东侧。总占地面积约为3720亩,总建筑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规划展馆面积10万平方米,并配套有国际会议中心、酒店、写字楼、公寓、商业、住宅等相关设施。中心造型新颖、外观宏伟,展馆主体外观造型似鲲鹏展翅,隐喻西安城市经济建设的腾飞。拥有先进的硬件设备及富于

现代感的中心广场,具有承办国际博览会、全国性经贸洽谈会的能力。

曲江国际会展中心和谐广场,是西部最现代化、最国际化、最具活力的集休闲、商务、集会为一体的市民文化广场。

西安曲江会展中心每年3月和8月份举行的西部最大的结婚产业博览会引领西部婚庆产业的发展,是西安结婚新人采购的第一平台。

西安曲江会展中心举行的西洽会、文博会、住房博览会、汽车博览会等已经成为西部乃至全国的大型展会。

隋唐长安城门趣闻(九)

——通化门

通化门，隋唐长安外郭城东面偏北门，遗址在今西安东郊长乐西路东段路北。

1.通化门外章敬寺

章敬寺位于唐通化门外。此处原为唐肃宗时大宦官鱼朝恩的东庄(鱼朝恩另有长安居宅在皇城南光行坊)。是庄连城对郭，林沼台榭，为京城形胜之地。大历二年(767年)，鱼朝恩献庄为寺，为代宗母章敬太后修荐冥福，故请以章敬为寺名，复加兴造，穷极壮丽。以建寺材木不足，鱼朝恩奏请毁拆曲江亭馆、华清宫观楼及百司行廨、将相没官宅给其用，土木之役，费逾万亿。寺内重殿复宇，有房舍 4130 余间，共 48 院。次年正月，代宗亲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贞元二年(786年)五月十九日，德宗敕令云：章敬寺是先朝创造，从今以后，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设斋行香，仍永为恒式。《长安志》卷七“通化门”条载：“德宗幸通化门，观章敬寺迎御书额。”贞元七年(791年)七月，德宗与皇太子及群臣出通化门临章敬寺，并赋诗唱和，题之寺壁。德宗《七月十五日题章敬寺》诗中云：“招提迓皇居，复道连重城。法筵会早秋，驾言记禅扃。”章敬寺旧址约在今西

安东郊长乐西路东端附近。

2.唐穆宗通化门送和亲公主

唐宪宗元和(806~820)时期，地处我国西北地区的回纥族，遣使来长安请婚。长庆二年(822年)二月，唐穆宗封第十妹为太和公主，册封为回纥可敦，和亲出嫁回纥登逻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同年五月，回纥可汗派遣其宰相、驸马、公主等人及驼马千余来长安迎婚。穆宗命左金吾卫大将军胡证充送婚使，光禄卿李宪充副使，太常卿李锐充婚礼使。临行之日，穆宗以宫廷仪仗亲自送别至通化门。“及发，上以半仗御通化门送之。敕常参官于章敬寺前立仗，仪卫甚盛。仍令京兆府权置公主幕次，暂驻受百僚之谒见，士女倾城观焉。”(《唐会要》卷六)

3.唐文宗寒食节通化门观游人

寒食节为清明节的前一天或前两天，寒食禁火。相传此俗起于春秋时晋文公(重耳)悼念介之推事。当年重耳在流亡十九年中得介之推辅佐，后回国成为国君，介之推隐于山中不仕。晋文公烧山逼他出来，介之推抱树被烧而死。晋文公为悼念介之推，禁止在他烧死之

●西安风情●

日生火煮饭,只吃冷食,叫寒食禁火,遂相沿成俗。其实按《周礼·司烜氏》记载:“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禁火为周时的旧制,汉刘向《别录》中有“寒食蹋蹴”的记载,寒食禁火之俗早已有之,似与介之推无关。

唐人重视寒食节与清明节,长安都人纷纷出城踏青春游或扫墓上坟。白居易《寒夜卧病》诗有:“喧喧里巷踏青归,笑闭柴门度寒食。”元稹《寒食日》诗:“今年寒食好风流,此日一家同出游。”除出城踏青扫墓外,民间此日还盛行打秋千、蹴鞠(足球)。韦庄《丙辰年郝州遇寒食城外醉吟》诗云:“满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雕阴寒食足游人,金凤罗衣湿麝薰。肠断入城芳草路,淡红香白一群群。”正因为寒食节长安空巷出城春游或打秋千蹴鞠为

乐,文宗于开成四年(839年)二月丙寅(十四日)“寒食节,上御通化门以观游人”(《旧唐书·文宗纪》)。

4.皇帝通化门饯别大臣

通化门为唐长安外郭城东面偏北门,是离长安东去关东经灞桥最近的一门,而且此门又临近长安城三大内宫殿区,因而唐代皇帝每于此门饯别东去大臣。如景龙三年(709年)八月十一日,中宗“亲送朔方总管韩国公张仁亶于通化门”(《旧唐书·中宗纪》);建中四年(783年)正月,龙武大将军哥舒曜进讨李希烈,德宗送别于通化门;元和三年(808年)九月,李希甫“充淮南节度使,上御通化门楼饯之”(《旧唐书·李吉甫传》);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三日,宰相裴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门慰勉之,度楼下衔涕而行”(《旧唐书·裴度传》)。

·解字·

“人”



①



②



③



④

这就是万物之灵的“人”。①是甲骨文,面朝左立着一个人,上端是头,向左下方伸展的一笔是臂,中间是身子,身子以下是腿。②是金文,③是小篆,基本上与甲骨文相同。小篆的腰部弯曲更大一些。④是楷书的写法,一点也看不出“人”的样子了。

用“人”组成的词是很多的,不过有几个词是应当注意的。如《尔雅·释木》中的“核人”,就是我们后世人所说的“果仁”。在这里“人”与“仁”是通用的。若见到老中医开药方时写“枣人五钱”,可别笑话人家写错了。其实,把“枣仁”写作“枣人”是有古代典籍作根据的。

我们读到张国宾的《合汗衫》第四折时,会见到“有甚么人事送些与老爷”的话。“人事”怎么还能送人呢?原来,这里是指“礼物”,意思是:“(你)有什么礼物送些给老爷!”

“人”字是个部首字,凡由“人”字所组成的字,大都与人有关,比如“介”、“从”、“仆”、“伐”、“休”、“伏”等字。





阎良核雕技艺

(富小云整理)

核雕亦称果核雕刻，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名噪文坛的魏学伊《核舟记》的精彩描述来看，核雕艺术在明代就已达到了博大与精细相结合的至高水平。传说桃木能驱邪灭灾，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用桃木刻制各种图腾制品，以供人们佩戴。它象征着吉祥、幸福和平安，桃核亦是桃木，它贴身佩戴的时间越长就越光润漂亮。特别是古时宫廷核雕工艺品，数百年来一直为核雕爱好者收藏。

我国的核雕技艺分两大流派：北派和南派。两派又分很多支脉，阎良核雕属北派西安一脉。此脉源出于清朝同治年间的山东，何时流传至西安尚无准确时间，主要以桃核雕刻为主。现年70岁的核雕艺人赵秉科老人，出生于艺人世家，16岁时师承北派核雕创始人孙光明先生，将这一绝技传承了下来，人称“桃核赵”。桃核质地坚硬，不易破碎，雕刻刀具皆由创作者根据多年经验需要特制而成，有剜刀、刻刀、削刀、刮刀等。主要刀法有剜、刻、拨、挑、刮、削等十多种技法。

阎良核雕的工艺流程十分复杂，工序达几十道之多。首先要备料，而备料则先需要选

择纹路清晰，质地良好的桃核，选好后要对桃核表面进行初步的清洗，消毒。为防止刻好的作品变形还要将其放入锅中蒸，然后对桃核表面再次进行仔细的清洗，除掉残余的果肉杂质后，将其放置阴暗处晾干。然后根据桃核的纹路、大小进行构思雕刻，技艺熟练的话可以直接下刀，不熟练的可以用铅笔勾画图形后再行下刀。雕刻时需要雕刻者眼、手、心合一，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否则前功尽弃。在雕刻的过程中为了使桃核纹路清晰便于观察，需不断用核桃油刷洗。为了防止作品生虫，作品大致成型后还须将桃仁用细针掏净。然后要用砂纸对成型作品进行细致的打磨，俗称“三分刻，七分工”，这一环节对作品的面世尤为重要。打磨完后再用核桃油浸润擦拭，一件作品这才算圆满完成。

阎良核雕的代表作品有《一百零八罗汉佛珠》、《长安八景》、《八仙过海》、《龙舟》、《渔家乐》等，每个人物只有米粒大小，五官清晰，造型生动，所刻的舟，船舱有门，船后有锚，锚链环环相扣，令人拍手叫绝。阎良核雕在立体微雕中美冠群芳，堪称一绝。它显示了我国传统工艺的悠久、博大、精深，是我国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瑰宝。

2007年5月，阎良核雕技艺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被确定为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哪个朝代 官员薪饷最高

中国古代的“秩禄”制度，等级森严，不允许僭越。秩是官秩，表示官位的高低；禄是俸禄，是朝廷发给官吏的薪饷。

官秩品在秦汉时以谷物多少计算。西汉从万石到佐史分为二十级，曹魏时以一品至九品定分为九级，南北朝逐渐改为正从九品十八级，隋唐沿袭南北朝的秩品等级，以后各朝也大抵如此。

俸禄的多少自然以官秩品为依据。汉代的官俸以谷物计算，最高秩万石月俸 350 斛。一斛相当于 14 公斤，故秩万石月俸约为谷物 4900 公斤，年计则为 55800 公斤。最低秩月俸仅为 3.6 斛，约 50 公斤。两者相差近百倍。

西晋至南北朝官员的俸禄按九品分高、中、低三个阶梯。从比较固定的米、绢、绵、菜田、占田收入看，三品以上为高阶，其中一品官月米 600 斛、绢 300 匹、绵 200 斤、菜田 10 顷、占有田 50 顷，以下每级差额为月米 30 斛、绢 100 匹、绵 50 斤、菜田 2 顷、占有田 5 顷；六品以上为中阶，七品以下为低阶，依次递减。所有官俸折合成米，一品官年收入 13800 斛(约 18 万公斤)，九品官为 2300 斛(约 3 万公斤)，一品官的俸禄是九品官的 6 倍。

隋朝的官俸以粮谷计算，年俸正一品为 900 石，从八品为 50 石。地方州县分九等，上上州刺史年俸 600 石，下下县县令年俸 60 石。除禄米外，还有职分田，京官一品给田 5 顷，之后每品以 50 亩为阶梯递减。

唐代官俸有职田、禄米、钱货。京官一品、外官二品授田 12 顷，京官八品、外官九品授田 2 顷 50 亩。武德初年，正一品禄米 700 石，从九品禄米 50 石。贞观时一品官月俸钱 6800 文，九品官为 1300 文。至唐后期，俸禄厚外官、薄京官。

宋朝百官的俸禄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最为优厚，月薪饷最高的达 400 贯(一贯为千文)，是汉代的 10 倍，清代的 2 至 6 倍。除俸钱外，还有禄米，每月最高者多达 150 石。宋神宗时每年收入钱 6000 万贯，仅官俸便占去四分之一。

宋朝无疑是士大夫的乐园，统治者给官员的待遇特别优厚，大小官员锦衣美食，生活奢华。可谓为官数载，一世荣华。优厚的待遇，使得宋代官员很少有自愿致仕(退休)的，很多官员年逾七十仍不想让位。有的为延长任职期限，竟改动或虚报年龄。

宋代如何解决违章建筑问题

从唐代长安到北宋开封,中国的大都会从坊市制演变为街市制。在这背后,是官府的禁街与百姓的侵街,是官与民争夺城市空间的一幕幕大戏。总的来说,官府对街市的管理渐趋宽松。

禁街与侵街,是自唐朝以来官府与百姓在大都市争夺空间、反复博弈的重要内容。

唐朝的长安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坊市制的典范和顶峰。宫城是皇帝起居和办公之所,皇城是中央各官署集中区域,外郭城则主要是居民区、商业区和寺观等建筑区。外郭城的主干街道南北 11 条,东西 14 条,最宽的是南北向的中央御街——朱雀大街,宽 155 米;最窄的顺城街,约 20 米;与外郭城各城门相通的街道宽都在 50 米以上,将外郭

城分隔成 100 多个坊区和 2 个市区。坊有坊墙,市有市墙,出入各有坊门和市门。除官署、寺庙和三品以上官员的住宅外,坊内住宅一律不得临街开门,商业活动也必须在指定的市场进行。

每到晚上,鼓声响过后,城门、坊门、市门按规定都要关闭,全城实行宵禁,没有官府的特别证明,一律不得在街上行走,违者将受到拘捕和处罚。街道也不允许私搭乱建。每次皇帝出行,盛陈仪仗,沿途静街,禁止行人,所过旗亭、市楼垂帘外蔽,更不允许普通百姓居高临下观望。由于长安城比较大,有的居民从城外回家,进了城门后,晚鼓擂动,城门、坊门、市门都纷纷关闭,不敢违反官府的禁令,只好躲在桥下蜷缩一夜,待天明晨鼓擂响后,再上街返回家中。

这种封闭的管理体制,给居民的生活和商品交易活动都带来极大的不便,唐朝中叶,随着都城人口的膨胀和商业的繁荣,出现了各种“侵街”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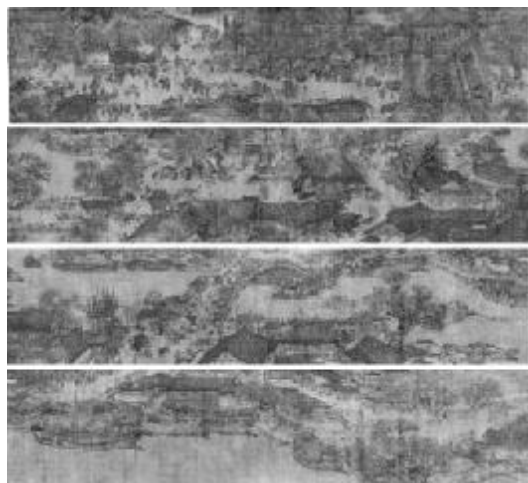
有的居民违反不得临街开门的规定,住宅大门朝街开;有的居民凿墙破洞,将屋舍扩建至街道;有的居民和军将占用原来警卫部队在街道执勤的房舍,并且大肆修造和扩建。在街道上,小商小贩日益活跃,卖胡饼的、卖鲜鱼的,都出现了。更有甚者,晨鼓未响,坊门已经先开;晚鼓已擂,坊门、市门仍不关闭,街道上行人来来往往、熙熙攘攘。还有的居民,置禁令于不顾,在道路上穿坑取土。



当时负责街道管理和治安的官员主要是左右街使和御史台。有关官员曾经多次上书,反映情况,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下达了多次拆迁令,强行拆除私搭乱建的房舍,对涉案官吏予以处罚,违法向街开启的门一律填塞。但由于人手有限,很难全面禁止。而京城以外的大城市,侵街现象更为严重。如扬州,地处水陆交通要冲,各地工商业者云集于此,侵街造舍极为普遍,以致街衢拥堵,难以行车。

在禁街与侵街的博弈中,北宋的开封从坊市制演变为街市制,禁街的条令已经大为宽松。

《清明上河图》是描绘北宋东京(开封)的画卷,生动展示了从封闭的坊市演变为开放的街市后,帝都的繁华与勃勃生机。从画面上看,因临街不得开门的禁令已经废止,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不再有固定的市场,街旁、桥上、巷内,都可以经商和交易。街鼓制度和宵禁制度也都被废除,夜市、早市接踵,商品品种丰富多样,尤其是食品种类繁多,少男少女沿着大街一路走一路吃,从早上吃到半夜,可以不重样,夜市才撤,早市又开。正如在北宋开封府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孟元老所撰《东京梦华录》中的描述:“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



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乐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

街道的管理宽松后,侵街的现象也日益加剧。与唐朝长安的宽阔街道相比,北宋开封的街道狭促了许多。按规定,主要街道大约宽30米,道路两旁还有排水沟和绿化树木。街道两边林立的店铺,因招徕顾客和商业经营的需求,常常将经营范围向道路中间“挺进”,加上市民、游人如织,道路的拥堵可想而知。皇帝出行,因不再禁街,从而也失去了往日的威严,随行的上至侍从百司官属下至厮役都“杂行道中”,“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

“侵街”的日趋严重,给城市的管理和居民的生活带来很多问题。一是引起交通拥堵,给出行带来不便;二是临街店铺侵占街道,也侵占了排水沟、绿化带,造成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违章建筑多为木构材料,容易引发火灾,开封城多次大火,临街店铺往往一烧就连成片,损失惨重;四是侵街的违章建筑不易管理,人员混杂,导致治安案件增加。

面对日益加剧的“侵街”现象,北宋朝廷采取了分别酌情的处理办法。

首先是皇帝的出行仪仗队主动减少随行人员,缩小规模;其次谨慎对待违章建筑,关系到基本民生则不强行拆除;而对贵族、官吏、商人非法侵街的行为,或强行拆撤,或对商人因“侵街”而增加的商业利润征税。

城市在扩大,人口在增加,“侵街”屡禁不止。对城管和流动摊贩之间的博弈如何评价、如何协调,仍然是中国大城市目前面临的问题。

房屋限购令古代版



西汉建国后不久,吕后当政的时候,朝廷颁布了如下规定:“欲益买宅,不比其宅,勿许。”这条规定的意思是说,你想买房,可以,但有一个条件:你要买的房子必须紧挨着你现有的房子。

为什么会出台这样奇怪的限购政策,一是政府不希望再出现土地兼并,不希望部分居民坐拥多处宅基而另一部分居民却身无立锥之地。事实上,一人想买房而刚好其邻居又想卖房的概率是不会很高的,因为这个缘故,西汉初年的住房交易也非常少见。二是西汉登记人口和房产,用的是很原始的“手实”加“举发”手段。家里有多少人,住多大面积的房子,自己报,这叫“手实”。同时,政府鼓励邻居检举揭发,揭发属实,抓去坐牢,没收家产,一半家产充公,一半家产用来赏给检举揭发人,以资奖励,这叫“举发”。邻居们想举发,必须

知道你家的底细,如果你经常搬家,邻居是很难清楚你家底细的,所以政府必须把每一户居民都尽可能固定到一个地方长期定居。这样一来,邻居便于检举,政府便于管理。

进入唐朝,这期间,出台了一种持续了一千多年的限购政策,叫做“求田问舍,先问亲邻”。就是买地皮也好,买房子也好,不光要经过原业主的同意,还必须经过原业主邻居和族人的首肯,否则,不管你付给原业主多少钱,在法律上都是不被承认的。这样做无非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保护宗族财产不流失。二是跟西汉时一样,为了便于亲邻检举,进而便于政府控制每一户居民。这样统计人口也好,征收赋税也好,勘破案件也好,都变得很容易。

从元朝开始,还出现了一种有趣的购房政策:不许当官的买房。到了明清两代,不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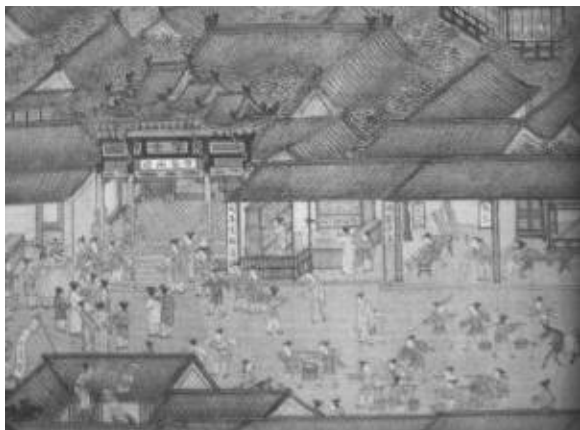
●文史拾趣●

官员买房的政策进一步扩大化,朝廷禁止所有官员在工作所在地买房。

明朝的规定是这样的:“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敢在工作所在地买房,让朝廷得知,扒光裤子打五十板,开除公职,最后还要没收你买的房子。

清朝除了照搬明朝的法律外,还规定:“旗员历任外省,有在任所置产者,勒限责令,变价回旗。如有隐匿不报,查出财产入官,地方官失察,照例议处。”不光限制官员购房,还限制旗人购房,凡旗人去外地工作,胆敢在工作所在地买房,其所买房产由朝廷强制拍卖,拍卖所得归政府所有。如发现旗人在工作所在地买房,当地官员也有责任向朝廷举报,如不举报,一旦查出,跟着买房的旗人一起受处分。

明清两代为何禁止官员在工作所在地买房,原因其实很简单:官员受贿的形式多种多样,唯独无偿或者低价受赠不动产难以查清,既然难查清,干脆就不让他们在工作所在地拥有房产。不管是谁,只要在任职地买了房,就默认他是贪污,就摘他的乌纱帽,打他的屁股,没收他的房子。



善出考题的 大宋皇帝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在位期间,任用奸相蔡京等人,吏治腐败,爆发了诸如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1125年金兵南下,宋徽宗传位于宋钦宗,自称太上皇。1127年被金兵俘虏北去,死于五国城(位于依兰县城北门外,距哈尔滨市 261 千米)。

宋徽宗政治上昏庸无能,在艺术上却是个天分极高的书画家,也是艺术活动的组织者和倡导者。他的书法,早年学薛稷、黄庭坚,参以褚遂良诸家,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号“瘦金体”。

宋徽宗重视翰林图画院,经常参与艺事

活动,亲自出题、批卷,还亲自授课,所出考题情趣盎然,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竹锁桥边卖酒家” “竹锁桥边卖酒家”是画院的著名试题之一。此次考试中,众多考生皆重于酒家,多以小溪流水、野渡小桥、竹林清风等借以衬托。最中赵佶之意的是一名叫李唐的画家,他的画独辟蹊径,画面上是一泓溪水,小桥横卧,桥边则是一片竹林,郁郁葱葱的翠竹中,挂着一幅迎风招展的“酒”帘。整个构图从“虚”字入手,使人浮想联翩。赵佶看后认为酒家藏在竹林中正符合“锁”字的意境,圈点为第一名。

“蝴蝶梦中家万里” 此题取自“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之意,最后被赵佶选中的是王道亨的画卷。王道亨笔下所绘的是苏武牧羊图,画面上苏武席地而卧,双蝶追逐其间,画中林木扶疏,上立子规,月正当空,木影在地,犹闻啼声。由于王道亨较好地掌握了诗的含意,因此一举夺魁。

“野渡无人舟自横” 此句选自唐朝诗人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应试者大多画一空舟系于涧边,或画一鹭鸶立在船上,或画一鸟落在船杆。但是受到赵佶赏识的却是画中一舟人,他卧于舟尾,手握一支笛子。原来,画者其意不在舟中无人,而是说明此野水无人过渡,连摆舟之人也无心吹笛,竟打起瞌睡来。中选者不愧为丹青高手。

“踏花归去马蹄香” 这个考题也是独具匠心的。考题一出,考生们几乎都在画马、画花、画达官显贵、画文人仕女,赵佶看后很不满意。在最后几张卷子中,赵佶被一幅画吸引了,一匹骏

马缓步走来,几只小小的蜜蜂在追逐着马蹄。作者的巧妙之处就是马踏上了花后竟然引来了蜜蜂,画面上既表现了“踏花归去”又表达了“马蹄香”。这就是作者的巧妙构思,理所当然地被评为第一名。

“深山藏古寺” “深山藏古寺”之题是赵佶亲自为画院出的题。此题目一出,众考生便纷纷作画,有的画青山丛中露一寺顶,有的在半山腰画一半古寺,有的则干脆画一寺在山中。其中只有一幅构思奇特的,画面上只有山水和一条羊肠小路,一个老和尚在溪边挑水,赵佶看后当即录此生为第一名。这幅画画得很简单,但其高明之处是把考题的“藏”字表现得淋漓尽致,既然有老和尚前来挑水,那么古寺定是藏在深山之中。

“嫩绿枝头红一点” “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须多”是这首诗的原意,故而当时的应试者大多在画面上用红花绿叶来装点春色,或在绿荫丛中露出红花一朵。然而高居榜首的却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画家,他在绿树成荫的阁亭中,画一仕女倚栏而立,其樱桃小口的一点红与嫩绿枝头相得益彰,从而点出了“红一点”的主题。



在我国封建王朝的文字狱中，尤以清代为甚，在清代文字狱中，又以康、雍、乾三朝为大盛时期。而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是一个极不合时宜的文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能与时俱进，他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在他的诗文和言谈话语中，表现得是很清楚的。随便找出他诗中的一句或文中一语，就可以定罪杀头。然而，这位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郑板桥竟未罹文网，实为异数。

纵观清代文字狱，大致有三种情形：一为皇帝偶然发现；二为臣子互相揭发；三为自投罗网，即一些人怀着卑微的个人目的投献诗文，希望得到皇帝的赏识，却不料撞在刀刃

上。而郑板桥则不然，这三条都与他沾不上边。

首先，郑板桥不易被皇帝发现。正如他的一方闲章所言，郑板桥一生做的最大的官，不过是个“七品官耳”。“县门一尺情犹隔，况是君门隔紫宸。”远离皇帝自然不易被发现。若为皇帝近臣，近水楼台，得便宜方便，致祸也容易。正如谚云：龙无恩，虎无义。山高皇帝远，龙虎何有于郑板桥。其次，郑板桥不值得鹰犬们揭发。郑板桥给其弟的信中说：“初志得一京官，聊为祖父争气，不料得此外任……”试想郑板桥当年如若得以京官，随手从他的诗文中拈出“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

自在囚”、“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崖中”、“栽得数竿清瘦竹，明年砍去作鱼竿”、“且让青山出一头，疏枝瘦干未能道，明年百尺龙孙发，多恐青山逊一筹”等诗句，只要鹰犬们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将诗中的“青”字与清王朝的“清”字发生联系，指出诗中有“清”也有“明”，“青山”不过是“破崖”，那么，郑板桥即使长着十个脑袋，也被砍尽杀绝了。好在郑板桥只是一县官，谁肯浪费时间去告发他呢？第三，郑板桥决不去自投罗网。郑板桥的个性决定他决不会向皇帝投献邀宠撒娇卖乖，更不会给皇上拍马屁。他深知拍马屁不是好营生。只有“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náng tuó)萧萧两袖寒”才是他的必然归宿。也正因为如此，郑板桥张扬个性为诗为文作书作画游刃有余于康、雍、乾时代，却没有落入文网。

郑板桥躲过“文字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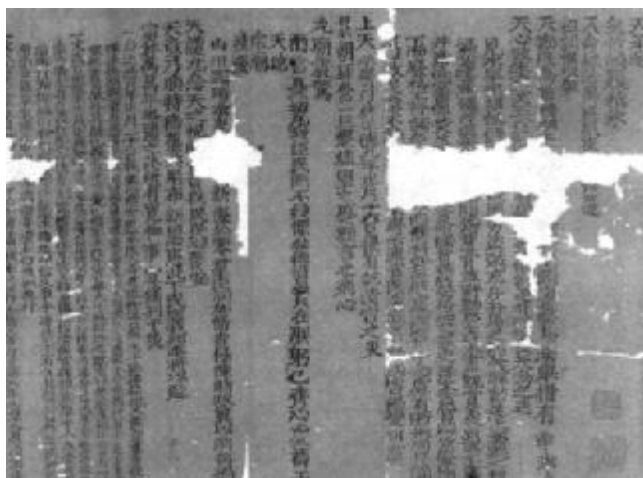


突发事件中“舆论引导”或“危机公关”，如今已热得发烫，其实在历史上早已有之，实在不算新鲜，而且运用之妙，可谓炉火纯青！

清朝初年大臣范文程，是北宋名相范仲淹第十七世孙，因其及时而恰当的舆论引导，让他成为满清定鼎中原的第一功臣！

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后，范文程当即建议顺治改变与闯王“并取中原、共享富贵”的既定策略，亲自起草并向全国发布檄文，旗帜鲜明地提出“消灭闯贼(李自成)，为崇祯帝和大明百姓复仇”的口号。

清兵占领北京后，范文程又建议清军为崇祯皇帝戴孝并诏告天下。两次舆论引导，让清军摇身成“义师”。因为占据了道义制高点，从而赢得了明朝汉族士大夫的广泛支持，大大削减了全国各地的抵抗。使得只有区区十几万的清军，最终建立中国最后也是最为辉煌的王朝——清朝。



罪己诏

史上最牛的危机公关

康熙帝曾盛赞范文程：“文程之策，可抵百万雄兵！”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他的孙子朱允炆即位，史称建文帝。建文帝接受大臣齐泰、黄子澄等的削藩建议，着手进行削藩。而盘踞在北平的燕王朱棣，拒不服从并举兵南下，这一举动明明属“谋逆”，但他却向全国告示，出师是为了“诛齐黄，清君侧”。有利的“舆论引导”，无疑争取了不少士族力量和民间的支持。攻入南京后，朱棣还为失踪的建文帝举行“国葬”并诏告天下，然后顺理成章自立为帝。与此同时，对于方孝儒等扰乱舆论视听者，则处以“灭十族”等

酷刑，格杀勿论！

如果让历史再回到 2000 年前，陈胜、吴广算得上较早的舆论引导高手。为了能一呼百应反抗暴政，他们装神弄鬼，学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被发配到渔阳戍边的 900 民夫惊诧狐狸怎么能说人话，以为是天意，便信以为真，最终引爆了中国历史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

历史上，通过各种舆论引导术，以争取多数，瓦解中间，孤立少数，从而改变历史进程的可谓不计其数，即使结局失败，也起到了严重削弱皇朝基础的作用。

汉文帝时，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藩，结果爆发“七国之乱”。“七王”打的就是“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尽管最终失败，但逼得汉景帝不得不杀掉晁错、下发“罪己诏”等以平息叛乱。唐安禄山以清君侧为由发动叛乱，虽然

中国古代书籍是如何演变的

现代图书装帧精美，但他们也是从古代的书籍一步步演变而来的。

甲骨的书



早在 3000 多年前的殷代后期，就出现了有关占卜吉凶的书。当时纸尚未发明，人们就地取材，以龟甲和兽骨为记录材料，把占卜的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这

就是最早的图书——甲骨的书。

石头的书

在古代，石头也用来作书写材料，甚至将整篇作品或整部著作刻于石上。

由于刻石的兴起，出现了拓印技术。石面上所刻的字，都是笔画凹入，可先将一张薄纸

用矾及白芨水浸泡，贴在刻石的表面；以软刷将纸刷匀，再轻轻捶打，将纸嵌入铭文的笔画之内，待纸干后，以细布包裹棉花做成的拓包，蘸以墨汁，将它在纸上均匀捶拓，将纸剥下来，便得到相同的复本。这一操作过程叫“拓”，用墨汁者称墨拓，用红颜料者谓朱拓，单张叫拓片，装连起来叫拓本。



拓本成为一种图书类型，后期的主要作用已不再是传播知识，而是书法艺术借以流传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图书。

简牍的书

在纸发明以前，简牍是我国书籍的最主要形式，对后世书籍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只做了两年瞎眼皇帝，后被其子谋杀，但也使得强大的大唐帝国从此走向下坡路。

每逢改朝换代，运用舆论引导术以争取民心，成为各方力量推翻王朝的不二利器！而在和平时期，当王朝遇到危机，历代帝王创造出的舆论引导术不胜枚举，“罪己诏”就是其中的一种。

历史证明，通过“罪己诏”术，确实可以起到平息民怨，消除矛盾，树立形象，争取支持的功效。北宋苏轼论“罪己诏”，曾一语道破天

机：“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

汉文帝是历史上下罪己诏最多的皇帝，只要一有大的灾害或者异象可能引发民变时，他就下“罪己诏”自我检讨一番，大多能赢得民心，为开创“文景之治”立下汗马功劳！

历史上最后一道“罪己诏”是光绪皇帝下的，大意是说自己由于德行与治国能力不足，引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惊扰了祖宗宗庙，还让老太后操心了！只可惜此时的王朝气数已尽，病入膏肓，“罪己诏”已于事无补。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也作“板”)写的叫“版牍”。超过 100 字的长文，就写在简策上，不到 100 字的短文，便写在木版上。写在木版上的文字大多数是官方文书。由于文字内容有异，其称谓有别，如军事的文书叫“檄”；用于告示者称之为“榜”；将信写于木版，然后再加一版叫做“检”。在检上写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姓名、地址叫做“署”——这是信封的起源。然后将两版合好捆扎，在打结的地方涂上黏土，盖上阴文印章，在黏土上出现凸起的字，这就是“封”，使用的黏土叫“封泥”。

由于写信的木版通常只有一尺长，故信函又叫“尺牍”。笺是古代一种短小的简牍，是供读书者随时注释的，它系在相应的简上以备参考之用。现在人们所说的笺注就是起源于此。

缣帛的书

竹简携带不便，而且每简容字有限，编简成册的长篇著作一旦散乱，则发生“错简”，再说简牍的编连所用的丝带、麻绳、皮带易被磨断，给阅读带来困难。

缣帛是丝织物，轻软平滑，面幅宽阔，易于着墨。幅的长短宽窄可以根据文字的多寡来剪裁，而且可随意折叠或卷起，收藏容易，携带方便；可以弥补简牍的不足。因此，帛书与简书并存，共同构成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简帛文化。

由于缣帛作书写材料价格昂贵，所以使用并不普遍。

古代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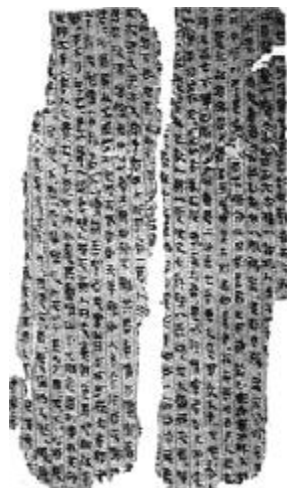
在纸发明初期，纸书并未完全取代简牍与缣帛图书，而是三者并用。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与提高，造纸规模不断扩大，到两晋南北朝时，纸张已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写本书取代了帛书。

古代写本书用纸，多经过了染色处理。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虫蛀和腐朽。古代染纸用一种名叫黄檗的植物汁浸染纸张，黄檗汁色黄，有防虫蛀之特效。

宋至清代的印本图书

我国古代的图书，从简策、卷轴到册叶制度形成了固定的版式，它起源于雕版印刷术，但活字印本书与写本书，也大多与此相同。

刻书用的木板，一般宽约一尺半，高约 7 至 8 寸，上边的空白叫天头，下边的空白叫地脚。一块版所占的面积叫“版面”或“匡郭”，版面四周的黑线叫“版框”，也叫“边栏”或“栏线”，简称“线”，四周单线印的叫“四周双边”，或叫“双边栏”。双线一般是一粗一细(外粗内细)，故又称“文武边栏”。还有一种仅左右印双线的叫“左右边线”或“左右双夹线”。此外还有一种总称为“花边”的，有“竹节栏”，四周是竹节花纹组成的图案线；有“博古栏”，四周用多种古乐器的花纹图案组成。版上的字，是经人手写而后摹刻的，所以各具风格。



孙中山使美人计除政敌



“护法运动”期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利用过一次“美人计”，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功。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宣布对德参战。但段祺瑞对外卖国，对内独裁，借口参战，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大量借款，用以发动内战，实现武力统一，并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准备召集由各省军阀指派的临时参议院。孙中山在1917年7月举起“护法”旗帜，8月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决定成立军政府，宣布段祺瑞为民国叛逆，出兵北伐。广东于是宣布与北洋军阀政府脱离关系。

但是时任广东省长、一贯作恶多端的朱庆澜，此时不但没有离职，反而表示拥护“护法”，继续赖在省长任上不走。据称朱庆澜之所以这样做，实际是奉段祺瑞密令，留在广州充作间谍。孙中山到广州后，发觉了朱庆澜的阴谋，想免去朱的省长职务，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很长一段时间，感到有些无奈。

朱庆澜是个好色之徒，颇有“登徒”癖，经常微服邀游于娼馆妓院之间，流连忘返。尤其常去女子学校“视察”，去则必然给学生亲自讲演，见姿色稍佳者便多方挑逗引诱，不达目的

决不罢手，以致被朱奸污的女学生不计其数。风声所播，广东人视女学为畏途，家家把成年女子深藏闺阁，再也不敢去上什么女子学校。

有一天，珠江长堤西濠酒店，忽然来了一双艳侣，翩翩裙屐，占尽风流。然而好梦未醒，突有多事的新闻记者当场指破，这对艳侣不是别人，一位是赫赫闻名的一省民政长官朱庆澜，一位是寄名某校的妓女小金铃。朱庆澜此时愧悔交集，为保全名誉，当场以三千元购买记者，请勿张扬。

但事后第二天广东某报竟有新闻一条，栏题为《伤风败俗之省长》，不问而知，写的是西濠酒店的事情。朱庆澜阅报抚心内咎，汗流浹背。过二天，风闻广东省议会又要就此事进行弹劾，于是不待省议会弹劾，朱庆澜即向国会提出辞呈，带着眷属离开广州，南方护法军政府的重要位置中，便无段祺瑞间谍侧身其中。

原来，这整个故事的导演，便是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得知朱好色之后，立即布置人密令来自香港的妓女小金铃，假冒到女子学校学习。小金铃是新从香港来的，很多花花公子都不了解她，因此五羊城中并无名气，算不上名妓。但此人丰神婀娜，体态轻盈，芙蓉如面柳如眉，秋水为神玉为骨。小金铃身为妓女本来惯于以色事人，况且先已有人示意过她，所以朱庆澜来校讲演，虽时间很短，但两人眉飞目挑早已情深意浓。

孙中山先生使用这一计策，大致理由有三：一是朱某人好色，美人计可谓对症下药；二是美人计好使，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炮，成本低，效果好；三是当时中山先生手下既没有绝对权力，也没有军队可供支配，只能选择这一没办法的办法了。

工程浩繁、成果优秀的旧志整理之作

——谈《西安府志》的整理与出版

◎ 阎琦



在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体系中，志书属于史部、地理类。然而无论是传统的“地理”还是“史”，都不能囊括地志的内容；地志的内容几乎是无所不包。除了地理（分野、疆界、建置），还要缕列名胜古迹、乡贤人物、异闻传说、货殖出产、相关诗文创作、历代任职官员以及学校选举等等，几乎就是一个地方的一部《史记》。它既是经济地理，更是政治地理、文化地理，以人文性、综合性见长，集地方知识的大全。

因为这个原因，非通才博识之人不可以为地志。《西安府志》的纂写者严长明，就是一位博识通才之人。据《清史稿》，可知他读书极博，学问极富，见闻极广，著述极丰，其学问、诗文成就，不在钱大昕、方苞、姚鼐之下。

人皆有“寻根问底”的习性。西安人的心

理要求是既要知道史前的西安如何样，要知道千年前的西安如何样，更要知道一二百年前的西安如何样。要知道史前的西安如何样，可以看半坡；要知道两千年前、千年前的西安如何样，可以看《三辅黄图》、《西京杂记》，宋敏求《长安志》，南宋程大昌《雍录》，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等，但是要知道一二百年

前的西安如何样，就无从了解了。明代有两部《陕西通志》，清代也有两部《陕西通志》，但专以西安为描述对象的书，则无。直到清中叶的严长明《西安府志》，西安人才知道今天的西安与昨天的西安的联系。虽然古今西安变化很大，但西安人每天面对着的，还是昨天的西安。看《长安志》、《两京城坊考》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你看了《西安府志》就会明白了。

旧地志的整理，我经历过两次。深深感到了旧志整理之难。

旧志都是大学问家编纂出来的，却无学者去从事整理，坊间所见多为影印本而无校点本。一个原因或者是整理的必要性不大；一个原因或者是整理的难度大，没有与编纂者

相对应的博学多识,恐怕也难当此任。

话说到《西安府志》的整理。粗读一过,我有四个感觉,或四点评价:一、年轻学者与老学者结合,最后由经验丰富的旧志整理行家里手完成,保证整理的质量,是一个值得推广的经验;二、体例完备,学术操作规范;三、工程量浩繁,校勘堪称精良;四、以标点、校勘两项工作合而观之,《府志》品质上乘,是高质量的旧志整理之作,称为旧志整理的范例,亦不为过。以下分别说明。

“无规矩不能成方圆”。《府志》的“校点说明”,详细而且严明,如同竞赛的规则,既是校点《府志》学术规范的起点,也标志着是《府志》学术规范的终点。

《府志》的标点,我没有发现错误(破句)。“破句”就是在不该断句的地方读断或点断,就是茄子、豇豆乱栽。好的、标准的句读,读来如顺水行船。标点的难,不在庐山中不知其难。即使是大家,也难免有出错的地方。鲁迅《花边文学·点句的难》:“常买旧书的人,有时会遇到一部书,开首加过句读,夹些破句,中部却停了笔:他点不下去了。”古人读书第一步就是句读,先把句子“破开”,这是基本功,时间久了,读的多了,就是深功夫。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读他人的著作论文,总是先站在旁观“挑刺”的立场。《府志》的标点,我没能挑出刺。这是很令我佩服的。

《府志》的校勘最繁杂,工程最浩繁。校勘一般的程序是先选定该书几个不同时期的刻本,校勘其异文,判断其正误,就行了。《府志》编成并刻于乾隆年间,此后别无刻本,所以无法进行“本校”而只能进行“他校”。“他校”之难难于“本校”。为什么呢?编

纂者严长明《序例》中说:“是编征引经籍,悉取原文,言择其雅,事从其核……昔人称人之著书,唯恐不出于己;吾之著书,唯恐不出于人。”像杜诗韩文,“无一事无来历,无一字无出处”。《府志》引书近千种,抄书者有誤,刻工有誤,原校对者粗疏有遗漏;古人引书,不但不标出版社,不标卷数,更无页码,而且压缩原文,甚至随意改动原文、割裂原文。这些,都要赖整理者一一校出。比如引文,首尾俱全者要加引号,压缩节引者不加引号,这个工程量该有多大!这还不算,《府志》的一般性叙述文字,有可能牵涉到古人、古事或古代典籍,这个数量也不少,也要一一找到原出处。一条校语,简单一点的十几个字,长的二三百个字,可能要花去校点者许多精力和时间。举一个例子。原书卷八《大川志》引用《长安志》文字,校语云:“所引《长安志》文字,今本《长安志》未见。”古人云:“谓有易,谓无难。”“今本未见”四字,非经过艰苦搜寻不能得出。古人坐拥书城,校书可以不出门户,今人绝对做不到这一点。《府志》校语3170条,合共十万余字,其出校之处有大有小,小处可以说是“其细如发”,其校勘的质量上乘,校勘工程量之浩大繁复,真正是无法具体言说!

合而观之,《西安府志》整理本是经得起检验的高质量旧志。它的出版,无论从文化意义、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前瞻意义以及旧志整理的学术规范化意义方面说,都是值得肯定并值得庆贺的。

《府志》的整理,并非无懈可击。但瑕不掩瑜,《府志》还是工程浩繁、质量上乘之作。

(本文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西安府志》

一项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 贾二强

众所周知,地方志对于一地行政变迁、建置沿革、山岳川泽、古迹名胜、关隘城防、人户消长、自然物产、赋税财经、重大事件、历史人物、风土人情、宗教寺观、文化发展等方面的记载,其详尽具体,具有其他文献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在宋代发展成

熟之后,历代均受到高度重视,迄于清末民初,存世传统形式地方志,至少达八九千种。

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的《西安府志》,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一项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言其珍贵,首先是由于这部志书的稀缺性。西安地区现存早期方志,当首推北宋大史学家宋敏求熙宁年间修成的《长安志》二十卷。此志体例完备,内容全面,在宋修方志中具有典范性代表性,因而极受后人推崇,清人赞誉道:“凡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至风俗物产、宫室寺院,纤悉毕具,其坊市曲折及唐盛时士大夫第宅所在,皆一一能举其处,粲然如指诸掌。……此志精博宏瞻,旧都遗事藉以获传,实非他地志所能及。”(《四库全书总目》)汉唐时期国都所在的关中人文兴盛,但在宋代以后,由于政治中心东移南

移,失去往日地位,人物寥寥,尽管修志已成一时风气,宋人所修方志约达 220 余种,但本地除此宋《志》外,长期没有一部可与媲美的方志。(南宋程大昌《雍录》所记虽为同地,但系一专题性考证著作,并非严格意义的方志。)现存宋元方志总计 43 种,除上述宋《志》程《录》外,也仅有一种元人骆天骧据前者分类抄撮而成的《类编长安志》,但其编排零乱,体例冗杂,加之新增材料无几,难尽人意,非高水平之作。不惟如此,在修志大盛于时的有明一代及清代前期,亦未见修成一部。这一局面直到清乾隆舒其绅修《西安府志》问世方得以改观。

关中地区为周秦汉唐故都所在,其历史地理状况为古今学人高度重视。《长安志》与《西安府志》所记地区大体相同,而后者是自前者成书后历经宋元明三朝至入清后 100 多年的又一同类志书,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正是此志最重要的价值所在。二书相比,后者 80 卷的卷帙为前者的 4 倍,据统计,援引经、史、子、集各种书籍达近千种,因此内容相当丰富,如仅“选举志”所载历代进士即达 566 人,其中历代名人多有相当详赡的传记。此志虽为官修,但其编订人严长明发挥了主要作用,其事经始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告竣于四十四年(1779),首尾历时四年,其间并曾“以兹事体大,率臆莫凭,乃携归金陵,搜荟群籍,凡与秦中文献关涉者,计得千数百种,类次区分,文成数万,致力可谓勤矣”。(见卷首毕沅《序》)。通过卷首其自撰“凡例”,亦可见其态度之审慎,思虑之周详。特别需要指出,严长明时为内阁侍读兼《一统志》馆纂修官,是一位以史才见长的学者,加之此时正是乾嘉考

据学的全盛时期,而毕沅又是一位以学术名震一时的封疆大吏,莅陕之后,留心于当地前代遗迹,此时已撰成《关中胜迹图志》。在西安知府舒其绅主持下,一批地方官员投入此志编撰,因而为其高质量的完成,提供了各方面的有力保证。是书刘墉序谓:“取材既博,义例复精,有张茂先(晋人张华)之博虚,有刘原父(宋人刘敞)之殚洽,盖几几乎与宋敏求《长安》一志方轨齐驱,至程大昌《雍录》、何景明《雍大记》、焦源清《雍胜略》诸书,有其过之无不及也。”洵非虚誉。展读之际,不仅清代中叶这一地区各方面的情状如历历在目,而且北宋以降 700 多年间史事亦斑斑可考。

《西安府志》是宋代以后直至上一世纪 90 年代新修《西安市志》问世以前这一地区的唯一一部志书。虽成书以后即行付梓,然 200 余年惟有此一刻而迄未再刊,时至今日传本已十分稀见,近年虽有影印本,但均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版)等大型丛书,一般读者使用者仍难得一见。尤其是迄无一部经过认真校勘标点符合现代读者阅读习惯的版本,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如今省社科院古籍办公室、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同仁颇具学术眼光和服务现实的意识,将此志经过精心整理后奉献给各界广大读者,是一桩很有意义的事情,相信它的出版,必将为西安的文化建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初阅之后,感到整理者态度是认真的,整体工作堪称专业,整理质量是有保证的,应当是一部可以放心使用的现代版本。

(本文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承古开新的 扛鼎之作

◎ 张永春

《西安府志》的整理校点工作,凝聚着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和陕西省社科院古籍所各位领导职工、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心血。全书整理校点工作历时两年,补出校勘记三千一百七十余条,约十万字,并撰写了《校点说明》。

《西安府志》整理校点成果是一项大型文化工程。西安作为世界四大古都之一,与中国文化一起发展,经历了历史的繁荣,营造并见证了华夏文明的兴盛。本次校点整理的八十卷本《西安府志》(以下简称“本志”),是清代乾隆年间西安知府、直隶河间府任丘县(今河北省任丘市)人舒其绅修,内阁侍读兼《一统志》馆纂修官、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籍著名学者严长明主持编纂,于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年)编纂完成。本志为地方志中“纂辑派”的典型之作,以引述各类文献典籍为记述的主要方式,且一般多为择其要点,间断引述。本志共出校勘记三千一百七十余条,另有多处校勘点合并出为一条校勘记者,则实际校勘点当大大多于此数。真可谓工程浩大,堪称精品!

《西安府志》整理校点成果是承古开新的扛鼎之作。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西安府志》是西安历史的百科全书,具有鲜明的西安特色和历史文献价值,以其资料丰富、考

证翔实、结构精当、体例严谨、文字优美、经世致用等特点,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方志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好评,是整理和开发古都西安历史文化积淀的重要资源。这次整理点校工作是修志的一次最佳杰出组合行动,积极保护了西安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为后人的阅读和使用提供了科学的基础和便利条件。

《西安府志》整理校点成果功在当代,利在后代。这项工作把握文化发展契机,肩负文化传承重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吹响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对文化改革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作为中华儿女必然要肩负的责任。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公民的热切盼望。在当今的世界环境下,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文化已经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更成为西安提升城市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突破口。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古城,传统文化赋予这座城市太多的荣耀,那些璀璨的文化与这座城市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继承和发挥传统文化成为这座城市的使命和责任。在多元文化对传统文化强烈冲击之时,在发展和繁荣西安文化的关键之时,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义不容辞地肩负起传承西安文化的历史重任。校点整理《西安府志》,是对传统文化的尊崇,是保护、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校点者们怀着高度的历史

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弘扬西安文化为己任,根据西安文化发展现实,突破文化发展瓶颈,创新发展模式,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重要力量。整理校点和研究《西安府志》,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西安 3100 年的建城史和 1100 年的建都史,对进一步认识西安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展现西安深厚的文化底蕴,传承祖国优秀的文明成果,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文献价值、使用价值。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整理校点本《西安府志》的出版,是在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号召下,在全社会期待回归传统文化的需求下,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本着对历史、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特有的人文、地理、诗词文化以及历史变迁,展现出了西安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让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西安文化,进一步认识西安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展现了西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传承西安特色历史文化中显示出应有的重要价值,对西安构建国际化大都市无疑是一股强大而持久的文化推动力!

(本文作者系西安市社科院研究员)



校点本《西安府志》

一部传世精品

◎ 赵建黎

《西安府志》是西安设府 600 多年来唯一的一部府志，该志撰修于清代乾隆盛世，以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著称，涵盖当时西安的历史地理、城防建置、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人物掌故等，实际上是一部古代西安的通史。由于原刻本流传不广，以前学者们搞研究，查阅很不方便。在新编方志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厚今而不

薄古，几年前就把目光投向这部 230 多年前文化人编纂的名志，决定将其整理公开出版，考虑到原版影印，对于缺乏古文功底的一般读者来说，仍然存在一定阅读障碍，因此决定出版校点整理本。这一设想得到了一贯注重文化传承的西安市领导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西安市政府还拨出专款对该项目予以资助，为其顺利出版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承担该书校点整理任务的省社科院古籍所，发扬团结协作精神，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点校工作。但市志办领导明白，出版整理本风险较大，稍不认真就会出力不讨好。前人有“明人刻书而书亡”的教训，当今也有一些古籍出版物质量粗糙备受诟病的案例，尤其是 2010 年 3 月经三秦出版社申报，《西安府志》被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对质量的要求又提上一个新高度。针对这一情况，市志办领导及时与校点者沟通，参照三秦社先前出版的《明

嘉靖陕西通志》《关中胜迹图志》等书的成功经验，决定约请史志整理专家对全稿进行仔细审校，打造经得起时间和读者检验的传世精品，并表示在进度和质量难以兼顾的情况下必须保证后者。根据这一精神，三秦出版社特意指定经验丰富、认真负责的编辑担任该书责任编辑，一方面把好古籍繁体变简体过程中的文字关，另一方面与审校专家同时对校样进行审读加工，对断句和校记反复推敲，查漏补缺，纠谬改错，通过多次切磋商讨，校记从 800 多条增加到 3700 多条，使书稿质量得到明显提升。整个审校过程中，组织者、整理者、责任编辑、审校者密切配合，精益求精，市志办的相关领导全程参与，甚至亲自下印刷厂督促改错。经过多方精诚合作，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点校本《西安府志》，不但使古籍珍本化身千百，嘉惠学人，而且广征博引，通过校注使原作的讹误和疏漏得到纠正弥补。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特意采取简体字横排的形式，可供更多人们阅读欣赏，领略传统史志的魅力。我们坚信，该书将与新编《西安市志》相互参比，相得益彰，发挥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也将会对传承和发掘千年古都西安的历史文化资源、建设文化强市、促进西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过该书的出版，我们真切感受到西安市志办团结协作、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质量至上的工作理念，精业敬业的精神风貌。尤其是为了保证质量，一再推迟出书时间，先后放弃了在世园会开园之际、国庆节前召开首发式的计划，没有赶进度。正是这种求真务实的态度，保证了该书的高质量出版。

(本文作者系三秦出版社总编辑)

传说中的古代九大毒药



断肠草 断肠草是葫蔓藤科里一年生的藤本植物。其主要的毒性物质是葫蔓藤碱。据记载,吃下后肠子会变黑黏连,人会腹痛不止而死。

鸩 鸩是一种传说中的猛禽,比鹰大。其羽毛有剧毒,用它的羽毛在酒中浸一下,酒就成了鸩酒,毒性很大,喝下几乎不可解救。久而久之,鸩酒就成了毒酒的统称。

番木鳖 番木鳖即马钱子,是马钱科植物马钱子和云南马钱子的种子。毒性成分主要为番木鳖碱和马钱子碱。吃后对听、视、味、感觉等过度敏感,继而发生典型的土的宁惊厥症状,最后呼吸肌强直窒息而死。

鹤顶红 鹤顶红其实是红信石,三氧化二砷的一种天然矿物,加工以后就是著名的砒霜。“鹤顶红”不过是古时对砒霜的一个隐讳说法。

砒石 砒石为天然产含砷矿物砷华、毒砂或雄黄等矿石的加工制成品,又名信石。

金刚石 人服食金刚石粉末后,金刚石粉末会黏在胃壁上,在长期的摩擦中,会让人得胃溃疡,不及时治疗会死于胃出血,是种难以让人提防的慢性毒剂。

夹竹桃 夹竹桃又名柳叶桃,含有强心毒甙,夹竹桃作用与洋地黄同,干燥的3克就能致人死亡。

乌头 毛茛科植物,多年生草本,其含有多种生物碱。乌头的有毒成分是二萜类生物碱,只要几毫克就可以让人丧命。

见血封喉 又名“毒箭木”、“剪刀树”,国家保护的濒危植物,是世界上最毒的植物种类之一。树汁呈乳白色,剧毒。一旦液汁经伤口进入血液,就有生命危险。古人常把它涂在箭头上,用以射杀野兽或敌人。



考试起源于中国

中国用来选拔行政官员的制度。据公元前 III5 年的记载，已对进入仕途的官员进行定期考核。”“考”与“试”是意义相近的两个概念，皆有考查、检测、考核等多重含义。将“考”与“试”二字连用，始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最初“考”字更侧重于考核政绩的含

义，“试”字更侧重于测试优劣的含义。当“考”与“试”合为一个词之后，其内涵逐渐演变为特指考查知识或技能的方法和制度。

考试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1910 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一版“考试”条说：“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是

穿小鞋的由来

封建社会，我国汉族妇女一直沿袭着缠足陋习，认为脚缠得越小就越美，并美其名曰“三寸金莲”。过去婚姻大事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根本互不相见，只能依照脚的大小，去衡量女人的美丑。因此，在媒婆说媒时，必然请男方看女方鞋的大小。一旦男方同意了亲事，就留下此鞋样儿，按此样尺寸做一双绣鞋连同订婚礼物一起送到女方家。成亲那天，新娘必须穿上这双绣鞋，以防脚大而受骗。女方如果当初故意把尺寸弄小，自然就穿着不舒服，甚至穿不上，从而出丑。后来，人们把这一风俗引申到社会生活中，用来专指那些在背后使坏点子整人，或利用某种特权寻机置人于困境的人为“给人穿小鞋”。



我国有关信箱、信筒的记载，始于唐朝。据《唐语林》记载，白居易在杭州当刺史时，与湖州太守钱徽、呈郡太守李襁都是好友，交往甚密，常以诗文互赠。后来，元稹守会稽，也参加了他们的诗歌酬唱活动，有《三州唱和集》。因为人各一方，他们就把诗稿放在竹筒里，互相寄送。这种竹筒就称“邮筒”。自唐代至明末清初，这种竹筒一直起着交换信件媒介的作用，可算是我国早期信箱、信筒的雏形。

我国最早的信箱

新年钟声 为何敲一百零八下

新年元旦零时，千年古刹大明寺敲响一百零八下钟声，喜迎新年。为何不多不少，只敲响一百零八下钟声？

据明代郎瑛所著《七修类稿》解释：“扣一百零八声者，一岁之意也。盖年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正得此数。”

古代以五日为一候，积六候而为一月，所以一年有七十二候。这一年中的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这三个数字相加，正好是一



百零八。佛家认为，“一百零八”在佛教里有佛的象征，所以不论口念一百零八遍经文，或拨动一百零八颗念珠，或敲一百零八下钟，这都是对“佛”表示最大的虔诚。

孔子生日究竟是哪天

关于孔子的生年问题由来已久，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由《史记·孔子世家》中“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得出的，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 551 年。但《史记·孔子世家》在叙述孔子卒年时说“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 479 年，计算可得孔子活了 72 岁，这可以用“虚岁”解释。但没有孔子出生的月、日记载。

《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都记载孔子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 552 年；都记载孔子出生日的纪日干支——庚子。不同的是，前者为十一月，后者为十月。

从纪日干支的排算可知：九月庚戌朔，

接着十月庚辰朔，接下去二十天后是庚子，则庚子只能出现在十月，可见《春秋公羊传》的记载是错的，而《春秋谷梁传》记载的十月庚子这天是可以推算出的。

这一天是公历的几月几日呢？由于春秋时代的历法和现在的夏历也是不同的，如何换算，目前尚无定论，先前某些孔子诞辰有误就与此有关。

后来，有学者求助于天文学。《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都记载这一年出了日食，经推算，公元前 552 年，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在曲阜见到一次食分达到 0.77 的大食分日偏食，这一天，纪日干支为庚戌，这就与两者“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记载完全吻合。这日为公元前 552 年 8 月 20 日。根据干支顺序作简单推算，结论是孔子诞生于公元前 552 年 10 月 9 日，公元前 479 年 3 月 9 日逝世。

不到十岁的娃娃皇帝有多少

封建社会,由于皇帝的宝座世袭,因此曾出现过许多乳臭未干的“娃娃皇帝”。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里,十岁以下的娃娃皇帝有 29 个。最早的娃娃皇帝是西汉的昭帝(公元前 86 年),最后一个是中国末代皇帝宣统(1909 年)。最小的是东汉的殇帝,生下来 100 多天就当了皇帝。两岁的有东汉的冲帝和东晋的穆帝。三岁的有北魏的孝文帝和清朝的宣统。四岁的有清朝的光绪。五岁的有东晋的成帝、北魏的孝明帝、南宋的恭帝。六岁的有清朝的顺治和同治。七岁的有后周

的恭帝和元朝的宁宗。八岁的共有

7 个:西汉的昭帝、东汉的质帝、三国的吴废帝、北齐的幼主、北周的静帝、南宋的帝爵、

清朝的康熙。九岁的有西汉的平帝、东魏的孝静帝、南宋的端帝、明代的英宗。十岁的有 5 个:东汉的和帝、三国时的魏废帝、南朝的宋后废帝和宋顺帝、北宋的哲宗。



「刺青」习俗源于何时

“刺青”起源于原始社会,文身只是早期的叫法。《礼记·王制》中记载:“东方日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意思是说古代东部沿海一带的民众从不束发,而是披头散发,身刺花纹,生吃食物。研究表明,早期的文身是为了表示区分部族,同时文身也是成年礼的一种方式。

宋代,刺青是一种非常流行的风俗。如《水浒传》第二回中,史进全身上下共刺了九条龙的花绣,因此在江湖上称



“九纹龙史进”。第四十四回中,对杨雄出场的外貌描写中有一句话就足“露出青靛般一身花绣”。在宋代人眼中,漂亮人物形象如果加上刺青,则

是美上加美。宋代还有身体刺青的审美大赛,《水浒传》第六十一回叫做“赛锦体”。卢俊义见燕青一身雪练似的白肉,于是请人给燕青刺了一身花绣。于是参加锦体比赛,燕青总是拿第一名。燕青正是凭着一身花绣,引得当时东京第一名妓李师师的垂青,李师师要燕青脱衣,让她一饱眼福。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上对刺青的欣赏。其他像宋代名将岳飞的背上就刺有“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现在海南省黎族还有刺青的民俗。刺青仪式选择秋天的一个吉日举行,由村中的主文婆主持仪式。主文婆先用鸡毛蘸着干香草加炭灰制成的蓝黑色文水,在女孩的脸、颈、身体和四肢上描画出代表本支黎族的图案符号。接着,用竹刺做的文针按所画文图一针一针地文刺,等文水渗入皮肤中,文身图案就终身保留。黎族文身现已被列为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浮云”“给力”“囧”



“浮云” 2010年，“浮云”成为网络热词，然而，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曾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用来表达对不义富贵的轻蔑。其实“浮云”在古诗文中亮相频率很高，含义丰富，如李白在《登金陵凤凰台》中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就在感



慨小人当道，怀才不遇的不爽。

“给力” “不给力”最开始在网络流行，是源于一部日本动漫的中文配音，有中国北方方言“不给劲”、“不带劲”的意思，“给力”表示支持，给劲。也有人指出，“给力”词其实来自闽南方言，很久以前就已使用。

“囧” 2008年以来，古汉语“囧”字，因为愁眉苦脸的外表被网友青睐。它与“窘”字同音，意义也基本相同，都表示一种尴尬之态。其实，这个字在古文中早有踪迹，如韩愈在《秋怀诗》中就写道：“虫鸣室幽幽，月吐窗囧囧。”但这里的“囧”是闪亮、发光之意。

大多数人认为高跟鞋源于西方，实际上中国的高跟鞋早于西方一百年出现。在14世纪的明朝，出现了一种时兴的女鞋，它在鞋底后部装有4至5厘米的高的长圆底跟，以丝绸裱裹。在定陵出土的文物中，皇后的鞋高跟



多于平跟，说明高跟鞋在当时贵族妇女中已经十分流行，其中的尖足凤头高跟鞋，制作十分讲究。

西方出现类

高跟鞋祖籍在中国

似的鞋要到15世纪。起初，高跟鞋是为了方便人们骑马时双脚能够扣紧马镫。直到16世纪末，高跟鞋才成为贵族的时尚玩意。据说，身材矮小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更高大、更威武、更具自信和权威，让鞋匠为他的鞋装上4寸高的鞋跟，并把跟部漆成红色以示其尊贵身份。到了17世纪，高跟鞋开始成为男女时装的一个重要元素。自那以后，鞋跟的高矮宽窄虽不时有变，但对高跟鞋的狂热却历久不衰。

施耐庵原名施彦瑞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其生平事迹，旧籍记载绝少，传说亦多参差。世以耐庵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元至顺进士，明洪武初去世，享年 75 岁。施耐庵原名彦端，改名“耐庵”，传说中有段故事。

江苏江阴祝塘有一大户徐麟，仰慕施耐庵才学，想延请他为孩子们讲学。一次，施耐庵和弟子罗贯中游学来到江阴，徐麟请他到祝塘徐家庄东边的东林庵稍住，并为徐家庄的孩子们讲学。施耐庵见东林庵背靠青山，三面环水，绿树成荫，十分幽静，便答应了徐麟在东林庵开坛讲学。他一边讲学，一边写作，闲暇时常常与徐麟品茶论诗。

一天，施耐庵与徐麟下棋，突然问道：“徐兄，你这庄院怎么会有庵呢？既有庵又为何未见和尚呢？”徐麟见问，便吩咐家人取来一副木鱼木槌，从容回答说：“施先生有所不知，这庵里原来住着一位老和尚，法名慧能。三十年前老夫请他来庵住持。这和尚十分虔诚，每天敲着木鱼诵经，直至圆寂，从不间断。”说着，他



用手指着木鱼的凹陷处：“你看，这就是慧能和尚敲了三十年的结果。我常常带着孩子们来这里，给他们讲述慧能念经的故事，并让他们看看这木鱼。我想让他们懂得，读书做学问一定要专心致志，日积月累，持之以恒。”

施耐庵若有所思，遂提起笔来书写“耐庵”两个大字，张贴在书室门楣上，意在告诫自己，也要像慧能那样耐得住庵院的寂寞，潜心写好《江湖豪杰传》(后改名为《忠义水浒传》，简称《水浒》)。

后来，人们便称他为“耐庵”先生，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名字不错，于是就干脆改名为“施耐庵”了。

宋代城市的演艺行业十分发达，演艺市场对于节目的需求量非常大。除了勾栏瓦舍的正规演出，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人们，也像今天的“达人秀”一样，有机会参加选秀，也有希望因演技出众而跻身演艺界。这些人在未“达”之时，每每被称为“路岐人”，在十字路口“撂地”卖艺。宋代的“达人”叫“道人”。当时“道”字在很宽泛的意义上运用，职

宋代也有“达人秀”

业叫“道业”，专门店叫“道店”，“道人”指有才能、有技术之人，所以元代的纺织业女改革家被尊称“黄道婆”。这里的“道”，与日语里“茶道”、“花道”等词汇的用法一致。由此可见，“达人”首先应当是“有道之人”。

曾国藩写活人挽联

曾国藩爱写挽联,以至于常给活人生挽。活人忌讳死,他就偷偷地写。

某年新春,好友汤鹏到曾府拜年,延入书房聊天,看见砚台下压着几张纸,以为是新作诗文,便要拿来看看,岂料曾国藩死死护住,

怎么也不给看。汤鹏抢将过来,原来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十几位曾氏好友,一一被曾“敬挽”一番的挽联稿。汤鹏大怒,拂衣而去,自此断交。而江忠源笃于友道,有客死京城的朋友,他一定想法送友人尸骨返乡。时人撮合两人行迹,说是“江忠源包送灵柩,曾国藩包作挽联”。

胸佩毛泽东像章最早始于何时

早在 1932 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为庆贺毛泽东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最先制作了毛泽东像章。

1943 年冬天,日本侵略军扫荡了新四军浙东根据地,杀害了地下工作者虞廷萃。虞廷萃的堂弟在收殓烈士遗体时,发现烈士的内衣中有一枚木质的毛泽东像章,直径大约 3 厘米,是为人工画刻。

1945 年党的七大前夕,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和延安鲁艺学院的同志特意制作了一批毛泽东像章献给七大主席团成员。这批像章直径为 2.5 厘米,由纯白锡灌铸而成。像章背面有别针,可以佩戴。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有关部门制作了一批毛泽东像章。1950 年,上海著名的“老凤祥”银楼为了表达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制造了一批 22K 金质毛泽东像章,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金质毛泽东像章。1951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制作了铜质毛泽东像章,直径为 5.6 厘米,像章正面刻有“抗美援朝纪念”字样。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制作毛泽东像章到了最高峰。当时生活虽然比较艰苦,但人们宁愿忍受饥饿,也要买上一枚像章佩在自己胸前,以示对党和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党中央和国务院为了节约金属材料,到 1980 年,制作毛泽东像章热有所降温。

1982 年 11 月 1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5 次会议通过《文物保护法》,将“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像章列为现代文物。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毛泽东像章被列入我国十大收藏品之一。

足球裁判穿黑衣的由来



1978 年以前,足球裁判不像现在这样在场内跑来跑去,而是坐在看台上进行裁判。但由于足球场场地大,坐在看台上裁判,不可能发现所有的犯规情况。后来决定裁判员到场内进行判决。裁判员在场内随运动员来回跑动而判决,易与运动员混淆。为使裁判员在场内区别于运动员,足球裁判员全部穿上黑色服装成为特殊的标志。据说,黑色是严肃的、庄重的象征,所以,为显示裁判员神圣地位,也着黑色服装,并被尊称为“黑衣法官”。

长安春望

◎ (唐) 卢纶

东风吹雨过青山，却望千门草色闲。
家在梦中何日到，春来江上几人还？
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
谁念为儒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

【鉴赏】

卢纶(748-800)，唐代诗人。字允言，河中蒲(今山西永济县)人。大历初，屡考进士不中，后得宰相元载的赏识，得补阆乡(在今河南省)尉。后又在河中任帅府判官，官至检校户部郎中。他是“大历十才子”之一，诗多送别酬答之作，也写过一些气势刚健的边塞诗和描写自然风光的景物诗，这些在中唐都是比较突出的。有《卢户部诗集》。

这首诗中抒发了诗人在乱离中的思家之情。诗体现了“十才子”诗中的“阴柔之美”。沈德潜《唐诗别裁》用这首诗作例子，将大历诗与盛唐诗进行了一番比较：“诗贵一语百媚，大历十子是也，尤贵一语百情，少陵摩诘是也。”并说这首《长安春望》“夷犹绰约，风致天然”。

“东风吹雨过青山，却望千门草色闲。”诗的开篇紧扣题目，写在长安“春望”。“东风”句，侧重写望中所见。卢纶是河中蒲人(今山西永济县人)，家乡刚好位于长安的东面，说“东风吹雨”，是说东风从家乡吹来，自然引出思乡之情。“却望”，是回头望。“千门”，泛指京城。“草色闲”的闲字用得巧，春草之闲正好与人心之

愁形成强烈对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首联是登高而望，在景语之中，流露出复杂感情。

颔联正面抒发思乡望归之情。“家在梦中何日到，春来江上几人还？”这两句为全诗警句，是春望时所产生的联想。出句是恨自己不能回去，家乡只能在梦中出现，对句是妒他人得归，恨自己难返，语中有不尽羡慕之意。“大历十才子”擅长描写细微的心理情态。

颈联又转入写景，仍然景中含情。“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川原”即家乡，这句说极目远望，家乡在浮云之外，渺不可见，远不可及。“宫阙”句又接至眼前近景，只见长安的宫殿，错落有致，笼罩在一片夕阳之中，这一联表面上写景很壮观，其实隐含着一种衰飒之意。

尾联收束到感时伤乱和思家盼归的主题。“谁念为儒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大意是说：自己以一儒生遭遇世难，独自客居长安，又有谁来怜悯我呢。“衰鬓”，并非指衰老，而是表现一种衰颓感伤的神态。沈德潜说“遭乱意上皆蕴含，至末点出”，确实如此。

这种“阴柔之美”，主要表现在诗中浓重的悲哀情绪。诗人感乱思家，眼中所见，心中所思，无非都是伤心之景，悲哀之情，浅吟低唱，一咏三叹，读后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怜悯，这正是阴柔美的表现，也正是《长安春望》及“十才子”许多诗篇审美特征的概括。